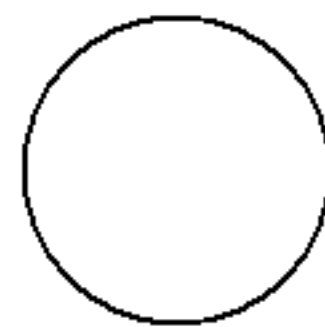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二年 1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做工作要敢于负责.....严 平 (5)

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高 戈 (9)

要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薛 崧 (13)

小评论一组(六篇)..... (17)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洪 桥 (26)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任为农 (29)

学习辩证法 改造低产田

.....湖北安陆县崔兴公社崔沟大队党支部 (34)

努力实现机械化

——徐州铁路分局车辆段的调查报告..... (38)



介绍一个清洁工人办的化工厂

..... 河北秦皇岛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42)

文 化 战 线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杨荣国 (45)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

..... 李炳淑 (55)

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

..... 辽宁清原县丁家街大队 孙卫东 (60)

我们是怎样巩固合作医疗的?

..... 陕西延安县南泥湾公社马坊大队医疗站 (63)

坚持农民业余教育二十年

..... 中国共产党蕲春县孙冲公社委员会 (66)

学 习 心 得

在实践斗争中增长才干

——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点体会

..... 西北国棉一厂 吴桂贤 (70)

要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学习《法兰西内战》的一点体会..... 东北机器制造厂 尉凤英 (76)

☆ 十二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毛主席语录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语录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
储一点，逐年增多。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 ○



思想评论

做工作要敢于负责

严平

做工作敢不敢负责，是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态度问题。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做工作一定要“敢于负责”，要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有极大的革命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各条战线上，朝气蓬勃，勤勤恳恳，依靠群众，努力工作，不断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在当前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下，党和人民要求我们继续抓紧批修整风，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这就需要我们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工作中进一步发扬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

我们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有大小不同的责任。挑起革命担子，做好党和人民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更加繁重、更加艰巨的任务。“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我们每个同志尽管能力有大小不同，但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担子拣重的挑，事情拣难的做，遇到需要担当责任的关头，决不躲避。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是毛主席长期培育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的体现，我们应该永远发扬光大。

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时，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这就是表示我们决心要干一辈子革命，挑一辈子重担，坚定地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伟大光荣的历史责任。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事业，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奋斗过程。我们现在仅仅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谁也不能说已把革命担子挑完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又有一个新阶段的任务摆在面前，革命的担子是永远挑不完的。如果不想挑担子或不愿挑重担子，得过且过，止步不前，自然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种人只能叫做“半截子革命”。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争挑重担永向前。过去挑了担子，有了贡献，现在和将来还要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任务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振奋继续革命精神，为人民多立新功。

在挑担子的过程中，自然要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无论是改造社会或改造自然的斗争，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干革命就是向困难作斗争，共产党人在任何困难面前应该是无所畏惧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应该鼓足勇气，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努力学习，开动机器，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反复实践，就一定能够把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担子挑好。你越是敢于和困难作斗争，困难也就比较容易克服。害怕困难，见难而退，是没有半点雄心壮志的懒汉懦夫世界观的表现，用这种态度对待工作的同志，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坚持革命原则，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开展斗争，这是做工作敢于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们要做工作，要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必然会遇到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干扰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只有坚持斗争哲学，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敢于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作斗争，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工作做好。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不同它斗，它就要危害革命。如果我们放弃斗争的责任，岂不是为阶级敌人的进攻开了方便之门吗？对于人民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如果不用正确的方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说服教育，任其发展下去，也会妨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以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失。所以，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敢不敢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仅是对工作是否负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的革命立场问题。

有的同志怕坚持原则、开展斗争触犯了人，对自己不利，主张学“乖”点，说什么要“多栽花，少栽刺”。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该说的不说，该管的不管，放弃原则，回避斗争。这同毛主席关于“**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也是同共产党员做工



作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不相容的。我们每个革命者在工作中一定要有高度的原则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态度明朗，旗帜鲜明。而那种所谓“多栽花，少栽刺”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是一种庸俗腐朽的市侩哲学。有的人以为奉行这种哲学，谁也不触犯，人人都满意，就可以不犯错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如果不抵制错误的东西，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那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脱离群众，这怎么还能不犯错误呢？那些自以为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想学得“乖巧”的人，不了解我们从过去的错误和挫折中应该总结、吸取的一条根本教训就是：只有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把各项革命工作做好。这才是我们应当学到的真正的聪明。如果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对待自己的错误，想从此学得“乖巧”起来，而不同那些违反党的原则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划清界限，就会被他们那些错误的东西缠住，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种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历史教训不少，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严重警惕吗？

敢于负责，就要在工作中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地解决各种问题。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三大革命运动中许多复杂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负责地拿出主意，加以解决。领导者的一项主要责任，就是“出主意”，就是要遵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研究制订出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具体意见，提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办法。但是，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碰到问题，“对了不点头，错了不摇头”。这些同志似乎也在做工作，但就是不分析矛盾，不解决问题。群众批评他们是“只求保险，不求有用；只顾省劲儿，哪管误事儿”。这决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

有的同志希望每一项工作中的细节都要上级指示，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作为上级领导，应当尽可能地给下级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总是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要贯彻落实还必须结合当时当地实际，拿出自己的办法来；要求上级对下级的每件事都作出具体规定，是不切合实际的。毛主席既为我们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为我们规定了各项具体工作的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有方向可循，有原则可依。不少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还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提出如何贯彻执行的具体意见，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好点子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只要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认真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就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好点子。事事都要等上级指示，表面上似乎组织观念很强，其实不过是怕负责任的一种借口罢了。

一个革命干部，政治上会不会犯大的错误，关键要看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实际出发，出主意，想办法，就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的方面也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点子出得越多，工作就做得越好。我们提出的意见也可能存在某些缺点或错误，当时不察觉，实践过程中发觉了，不要紧，只要及时总结，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就能把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相反，如果不积极主动地去分清什么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和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清醒地负责地进行工作，即使你自己不出点子，也会稀里糊涂地跟上别人的错主张、错点子跑，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仍然不免要上当受骗，甚至还会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是当前批修整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高度的责任心。路线斗争并不是不可捉摸的，是非界限并不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学会比较和鉴别，并善于综合群众性的大批判中的优秀成果，界限是完全可以划清的。正是在这种鉴别和批判中，最能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回避问题或者信口开河，不进行认真的思考，不进行具体的分析，都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我们决不当采取这种态度。

做工作敢于负责，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毛主席教导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的五个“必须做到”都指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这就要求我们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同刘少奇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公私溶化论”以及“一本万利”的生意经之类的剥削阶级的腐朽哲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对工作是否敢于负责，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也就是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有没有继续革命觉悟的重要标准。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思想作风，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当前继续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中，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抛掉庸俗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进一步培养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更大的胜利。



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

高 戈

随着批修整风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发展。整个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茁壮地成长起来。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工农兵上大学，这是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出现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这一变革实现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是教育史上的深刻革命和崭新篇章。广大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比较高，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他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革命干部和教师的热情帮助下，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革命刻苦学习，奋发图强，朝气蓬勃，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力求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切革命的同志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当然，在前进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正如马克思说的，“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广大革命师生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目标出发，不是掩盖矛盾，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努力解决这些新的矛盾，使教育质量日益提高。有的人对一些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不善于区分主流和支流，或者自觉不自觉地用旧尺子量新事物，因而往往表现出看不起、看不惯，或者信心不足的情绪。这种态度和观点都是不对的。教育革命深入到教学领域中去之后，当然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经验的过程。同时，对于教育质量必须从德、智、体三方面来看；就是在智育方面，也不能单纯地看学员掌握了多少书本知识，还要看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知识学得怎样，更要看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来提高，决不能象鲁迅在小说中描写的孔乙己那样，迂腐昏愤地从茴香豆的茴字教人如何学会“回”字有四种写法，更不能因为工农兵学员不掌握这一类小玩艺而议论讥笑他们。

对待新生事物，不同的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坚信革命的新生事物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对新生事物总是满怀信心，热情鼓励，寄予无限希望，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同时，又及时总结经验，具体地解决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帮助它健康地发展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看到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燎原之势，坚决驳斥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失败主义论调，及时总结了进行武装斗争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看到他们代表了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坚决刹住了刘少奇一伙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大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歪风，又及时规定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对待农民中各个阶层和农村中各项工作的一系列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引导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些事例，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新生事物的光辉榜样。鸡毛是一定会飞上天的，今天，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工农兵上大学这件新生事物一经诞生，就必然会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成长起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不少“卑贱者”依靠长期的实践和个人的钻研，尚且能够在科学文化领域中有所发明创造，那么，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工人阶级进入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有领导、有计划地让大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进学校学习革命理论，掌握科学文化，鼓励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打破自卑感，树立自信心，勤学苦练，敢于创新，有什么理由说不能培养出大量无产阶级的优秀人材来呢？一些由于缺少经验而产生的问题，只要实事求是加以总结，是不难解决的。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正在并且必将逐步成长起来。

开门办学，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这是破除千百年来“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几年来，广大革命师生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文



科坚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理工科实行厂（社）校挂钩，多种形式，开门办学，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大力加强理论研究。总之，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使教育战线出现了热气腾腾、生动活泼的崭新局面。但是，也有一些人把开门办学这种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看作只是“出出进进”，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允许他们对新事物、新制度有一个在实践中理解和适应的过程，更要启发他们自觉地克服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因为在他们头脑里，旧学校的那种形象还时隐时现：一提起大学，就只想到“平静的书斋”；一说要努力读书，参加社会实践的劲头就不那么大了。他们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对新路子还不熟悉。一遇困难，就容易自觉不自觉地驾起轻车，就着熟路走。有的人既不真正理解为革命刻苦钻研，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的重大战略意义，缺乏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又不懂得只有坚持政治统帅业务，不断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获取发展理论的强大源泉，善于集中广大工农群众的无穷智慧，才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迎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我们应当热情耐心地帮助他们认真学习和实践，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原则性，克服知识分子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使他们认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适应革命事业的新发展，热情对待新生事物。如果因为新生事物在前进中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动摇起来，甚至加以挑剔指责，那就会同历史前进的步伐背道而驰。毛主席早就说过：“**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教育战线历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同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切旧教育思想、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决裂，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有阶级敌人的破坏，也有来自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干扰。一九五八年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教育革命的热潮，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冲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刘少奇一类骗子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反攻倒算，妄图把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奋起造旧教育制度的反。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竭力干扰和破坏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同样地肆意糟踏革命的新生事物。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恶意歪曲、破坏毛主席《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政治同业务的辩证关系等，其目的，都是妄想把教育革命引向邪路，使工农兵学员不能为革命学到有用的知识，破坏我们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和发展



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他们极端仇恨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反对从工农兵群众中选拔大学生。他们鼓噪一时的所谓“探索”“新路”，说穿了就是要人们脱离毛主席早已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道路，跟着他们在新形势下走封资修教育的老路。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他们一贯极右，而“左”的词句只不过用以掩盖右的实质。尽管他们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但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就是阴谋对抗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总结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我们的头脑就会清醒起来。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就得经过艰苦、激烈的斗争。这几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教育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出现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干扰，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表现。我们要记取历史的经验，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干扰，同时，在反对一种倾向时，必须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对于我们的工作，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对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要具体分析，分清是刘少奇一类骗子谬论的影响还是实践经验不足等方面的因素，用辩证的方法加以总结，严肃认真地逐一将它们解决。对于一些同志受到谬论的影响，要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努力提高思想和政治路线觉悟。对于经验不足，以及前进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则通过实践积累经验，通过总结提高认识。排除干扰，改进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革命方向，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决不能搞形而上学，象倒洗澡水时连盆里的婴孩也一起倒掉。至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和攻击，那任何时候总是会有的。列宁深刻揭露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会“对我们在采伐古老森林的时候砍下的每块多余的木片而狂吠”。列宁说：“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道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还在试验阶段。人们的认识要在实践中丰富、提高，新生事物要在斗争中完善、发展。不管前进过程中还要遇到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那么，各项工作就能越做越好，教育革命就一定能继续健康发展。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革命的新生事物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天地和光明的前途，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一定会开出更鲜艳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让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要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薛 崧



批修整风运动正在继续深入发展。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谬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和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深入批修整风，要求我们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结合实际，划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一些具体问题，界限一时还划不清楚。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回避，还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这是关系到批修整风继续深入，各个领域斗、批、改继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分辨清楚，正好说明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些还没有完全分辨清楚的问题，往往正是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正确回答的问题。要使批修整风运动结合实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抓住这些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分清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就要求我们用气力，下功夫，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而不能怕麻烦，怕困难，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

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和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表现。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毛主席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主席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



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阶级敌人，粉碎了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同充分发挥全党的党员和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精神和创造精神分不开的。

批修整风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同样需要充分发挥全党的党员和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积极精神。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待每一个问题，都应当而且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广大党员和干部又经历过多次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只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批修整风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得到正确的回答。

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不就是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批判和斗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析和研究，才使路线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一步步提高的吗？有一些现在已经弄清的问题，当初也不是一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比如，在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刘少奇一类骗子曾经散布过“驯服工具”论，也鼓吹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这些谬论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界限在哪里呢？错误在哪里呢？许多同志都是有一个学习和认识过程的。毛主席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许多同志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这两条原理的有关教导，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而离开广大革命群众，党的领导也就无从实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衡量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驯服工具”论，就看出它的罪恶目的是要取消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鼓吹奴隶主义，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衡量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就看出它的罪恶目的是要取消群众运动中党的领导，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阶级阵线。两种货色，一个反动本质，就是妄图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反对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阻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间的界限本来是泾渭分明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尽管鱼目混珠，终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不能抹杀客观存在着的界限。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复杂的问题，必须经过认真学习和反复研究，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解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包括同“左”和右的界限，毕竟是客观存在着的。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肯于用



心去想一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这些界限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弄清。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不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弄明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自觉的革命者。列宁曾经说过：“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几个争论问题》）如果对批修整风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愿下功夫，害怕用脑子，不通过认真读书和调查研究切实弄清弄懂，就会陷入盲目性，那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要付出代价的。

正确的认识来源于革命的实践。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加深的。我们对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是在同它斗争中逐步提高的。因此，要解决好批修整风中遇到的问题，必须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经验。

我们党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有的同志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有右的教训，也有“左”的教训。这是很宝贵的财富。全面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使我们增添批判修正主义的力量和智慧，提高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例如，有的单位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政治和技术对立起来的种种谬论时，许多同志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加深了对政治和技术的关系的理解。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政治和技术对立起来，鼓吹“技术第一”和“技术无用”，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对技术的领导权。否定政治的领导作用和统帅地位，把技术置于政治之上，或者和政治平行，那就会犯“技术第一”的错误；抛弃技术这个为政治服务的手段，鄙薄技术，放弃对技术的领导，放弃培养无产阶级技术队伍的重要工作，那就会犯“技术无用”的错误。这两者都是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技术，钻研技术，使技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论政策》）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为我们指出了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分清路线是非的重要途径。善于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解决批修整风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同志受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影响，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向，是由于没有经验。要从没有经验变为有经验，就要勇于解剖自己，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我们总是



在克服缺点错误中，才能不断前进。通过总结反右、反“左”的经验教训，就能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起来，增加对错误倾向的辨别力，不会因反对一种错误倾向而陷入另一种错误倾向，从而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必须善于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本质，揭露其欺骗性，剥掉他们的诡辩和伪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修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进一步，退两步》）刘少奇一类骗子总是极力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界限，用剽窃和抄袭来夹带他们的私货，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掩盖他们的反动本质，欺世惑众。他们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妄图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这种恶劣的反革命手法，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使得我们一些路线觉悟不高、识别能力不强的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弄不清是非界限。但是，这种欺骗只有当其反革命本质未被揭露时才能起作用。一旦彻底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弄清了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庐山真面目”，那些被他们弄混乱了的问题就能比较明确地得到澄清。它们的欺骗作用会反过来帮助人们认识阶级敌人的毒辣，那些诡辩也会反过来教育我们认识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的重要。因此，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我们要反复地揭露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罪恶本质。这个问题揭透了，批深了，查清了，有一些具体界限就能较快地划清。

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有时也可能发生一些偏差，出现一点毛病。但是，不能因为怕出毛病和偏差就不去积极地解决问题。做一个革命者，不去积极地解决问题，遇到问题绕开走，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吗？回避批修整风中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回避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态度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其实，问题是客观存在着的，回避问题，只能妨碍我们觉悟的提高，贻误我们的工作。认识问题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不够全面到比较全面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解决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深化、逐步完善的过程。对批修整风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解决和回答得不全面、不深刻，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如果有了错误，一经发现，改正过来就是了。至于那种作为一种倾向出现的问题，则必须予以注意和警惕。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把一个正确的口号接过去而加以歪曲，常常是别有用心的人破坏革命运动惯用的手法。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高度地发挥全党的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善于开动机器，更好地解决批修整风中遇到的问题，夺取更大的胜利。



小评论一组

(六篇)

不能过早地“一锤定音”

江苏高淳县丹湖公社评论组

常言道：“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干领导工作，也经常碰到在什么时候下判断、作结论、“一锤定音”的问题。

我们公社的花北大队，一千四百多亩耕地，都处在圩区的“锅底岩”里，多数是长期低产的“冷浸田”。去年，这个大队的群众主张结合秋收秋种，开挖“沥水沟”，降低地下水，改造低产田。公社有的领导同志觉得这个主意好是好，就是提得不是时候：“眼下既要抢收，又要抢种，一人要顶两人用，那有工夫去开沟，弄不好还会两头落空。”就这么一锤，定了“音”。但是，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通过分析主客观条件，合理安排了劳动力，还是动手干起来了。公社领导同志看到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原先的忧虑一冲而散，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战斗，带领群众奋战二十多天，挖土一万多方，开成了总长三千多公尺的“沥水沟”；全大队的秋收秋种也搞得又快又好。

这件事说明，不能过早地“一锤定音”，否则往往会把事情做错。“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领导的正确指挥，也只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了解。在情况没有弄明白之前，过早地“定音”，势必造成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这样定出来的“音”，不是基调低了，就是调子高了。低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就会犯右的错误；高了，超越于客观条件的许可，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得不到



正确的指导，又会犯“左”的错误。不论右还是“左”，都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有的同志自认为对自己领导的单位熟悉，或对自己从事的某项工作熟悉，所以遇到事情总爱匆忙地下结论。其实，真的那么熟悉吗？这要具体分析。你对有些情况可能熟悉，对所碰到的具体问题是否也熟悉？你对这个问题过去的情况可能熟悉，对它的现在是否也熟悉？这么一问，恐怕就难免要犹疑了。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该随之而发展，不能停止在一个地方。一个人一时一地的经验不等于普遍真理，一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如果不注意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当前的客观实际，“锤子”在手乱定“音”，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情况不明就下判断，还会使自己上阶级敌人的当，在政治上走偏方向，这就更需要谨慎了。

喜欢过早地“一锤定音”者，不喜欢听取群众意见。他们觉得群众七嘴八舌，意见很难统一，不如自己说了算来得痛快、省事。他们不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好主意常常从群众的七嘴八舌中来，好办法要到群众中去寻找。花北大队开挖“沥水沟”改造“冷浸田”的建议，不就是社员群众提出来的吗？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当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既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又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使自己变得聪明些。如果总是主观地下判断，出主意，必然会给工作带来损失。

我们反对过早地“一锤定音”，不是说不要“定音”。“音”总是要定的。光议论而无结果是不行的。但是，“**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音”也只能定在调查研究之后，定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一锤子把“音”定准，使自己的思想、计划、办法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过早地“一锤定音”呢？主要是受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毒害，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毛病和“领导高明”的思想。要挖掉这个病根，就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的书，攻读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肃清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流毒，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克服了过早地“一锤定音”的毛病，才能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靠“狠刹一阵”行吗？

上海新华电器模具厂党支部

现在我们厂里，革命、生产一片热气腾腾。但在前一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些纪律松懈、制度执行不严的现象，革命和生产受到了某些影响。开始，我们对这种现象，一律叫做“无政府主义”，都采取“狠狠刹一刹，上纲上线批一批”。谁知这样做，虽“太平”一时，但没过几天，又是老样子。

“狠刹一阵”，为啥不见效？

关键在于对所谓“无政府主义”现象不作具体分析。过去，我们把开会学习经常不参加，对某些规章制度不执行，工作时间迟到早退等纪律松懈的现象，统统都说成是“无政府主义”，把有这种现象表现的人划入“狠狠刹一刹”的范围。这样不作分析地盲目“刹”一阵，不就“刹”到群众头上去了吗？结果当然不行。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派别，它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顶帽子是不能到处乱套的。群众中的少数人有一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是一种自由主义或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最多也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怎么能不加区分地一概当作“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呢？那样做，必然扩大打击面，不仅不能改变落后面貌，反而会使我们自己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

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谈到如何纠正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时，除了“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之外，同时强调了要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第二条就是“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毛主席说得多么对症啊！我们在了解和分析所谓无政府主义的现象中，发现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我们领导上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作风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造成的。比如，有的是我们生产上安排不周，分工太死，管理又没有走上轨道，常常使得一部分工人停工待料，特别是月初，只好“坐冷板凳”。有的是我们对有各种思想问题的人，包括有的在运动中受过一些冲击的人，没有过细地做思想工作，讲道理不够，他们头脑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还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就



凭印象下了个“无政府主义严重”的结论。如有一个钳工小组，一直听说是“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风凉”。这次下去一了解，才知道小组三十个工人中，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是个别人，大多数人一直坚守岗位，但好的无人夸，差的无人帮，正气抬不了头。纪律松懈，当然有本人的世界观问题，但过去我们只看到这一点，对这些同志不关心，不帮助，这不是反映领导作风上的问题吗？而我们却又把革命生产上不去，一概看作是群众“闹无政府主义”的结果，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这不更是一种片面性吗？

实行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要靠先进分子的觉悟和模范作用，靠干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靠对群众进行路线教育才能达到。对纪律松懈的同志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毛主席说：“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做思想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靠“雷厉风行”。正象《海港》中方海珍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思想用杠棒是打不掉的。”只有帮助群众从思想上认识遵守纪律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意义，帮助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才能使少数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人从思想上真正转变过来。

解决纪律松懈的问题，应该采取“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过去，我们为了整顿纪律，曾经宣布过几条行政命令，结果并不见效。后来废除了不合理的制度，抓了路线教育，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气象。这个对比说明，有些制度群众不执行，就要查一查这些制度是否合理。工人都懂得：为了进行生产，合理的制度是必需的。只要同群众讲清道理，群众会自觉遵守的。有个青年，原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严重，过去对他就是“上纲上线批一通”，并无转变。以后我们对他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领导做、群众做、家庭配合做，促使这个青年转变过来了，学习、生产都很积极。他的转变，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我们干部。

真正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敌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决不能麻痹或退让。我们厂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背后极力向青年灌输吃、喝、玩、乐，煽动“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我们把这个坏蛋揪了出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使大家受到了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这样做，批判了坏人，教育了好人，歪风抬不了头，正气得到了发扬。同时我们又依靠群众，改进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制订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了企业管理，使全厂革命朝气蓬勃，生产月月上升。



知 错 就 改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 程 平

前些日子，我们部队要办一个家属工厂。干部战士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修旧利废，自制、革新了一些机器，但是还有一些零件一时配备不齐。这时，一位领导同志便派有关人员到部队支左的单位，通过熟人关系，搞来了一些零件。机关的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对此提出了批评。这位领导同志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查，并表示坚决改正，把零件退回去。这时，有的同志讲：“知错就行了，零件已经买回，就不要再退了。”可这位领导同志说：“有了错误，仅仅知错还不够，必须知错改错。这才符合人民利益。”他很快退回了这些零件，并向那个单位做了检讨。

这个同志的话说得好。他知错就改，这种精神可贵！

知错就改，可贵的在于它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一种同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的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一个人在具体工作中总会出一些错误。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我们稍一放松警惕，就可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就有可能犯错误。有了错误就要迅速、彻底地改正。这样才能真正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怕的是坚持错误，不去改正。因此，认真严肃地对待缺点、错误，不是文过饰非，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原谅自己，而是敢于把它亮出来，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帮助，这种老实态度，这种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很值得发扬。

俗话说得好，“小洞疏忽，大洞难堵”，“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就是从一些“小事”上乘虚而入的。小错不改，可能铸成大错。生活上的错误可能发展成政治上的错误，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可能导致路线错误。有些事情，看来不大，其实不小。有人可能觉得通过熟人买几个机器零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本质上看，它却是与思想作风甚至政治路线相关联的。此错不改，就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改了，就符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一个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的人，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自己的。如果“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是从一分钱、一双鞋的“小事”上做起，还谈得上“拒腐蚀，



永不沾”吗？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散布“小节无害论”，就是妄图从所谓“小事”上打开缺口，把我们引上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道路。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改正错误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战胜自己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剜掉身上的毒疮，总是要疼痛一番的；清除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灰尘，当然不是“反掌”之易。但是，去掉了思想上的灰尘，克服了自己身上的毛病，思想就能提高一步。我们要发扬知错就改的无产阶级优良作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越来越兴旺。

改 得 好！

湖南岳阳县南正街综合商店评论组

在柜台上，有这样一件事：

一位老年社员递过来一张清单，上面写着：呢子、毛线、皮鞋……一算，共值三百多元。

“同志，这是我孩子办喜事用的，请你好好选一选。”

营业员满腔热情迎上来：

“老人家，孩子结婚是件喜事，可要注意节约。”

“如今托党和毛主席的福，日子越过越好，才办得起这样的喜事哩！”

“是呀！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劳动人民才过上了幸福日子，可是不能忘了旧社会的苦，不能忘了世界上还在受剥削的人民，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还要支援世界革命。我们劳动人民，有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

一席话打动了老人。“对！同志，亏你提醒，办什么事都要勤俭节约，这桩喜事我也要新办。请你帮我把清单改改吧。”

营业员和老人一起商量，选好了一些必需用品。老人家看着改好的清单，连声说：“改得好！改得好！”

改得好！改变了过去那种你买我卖的单纯买卖关系，既是营业员，又是政治宣传员，热情洋溢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改得好！改变了过去那种认钱不讲革命原则的经营思想。社会主义的服务行业，不能单纯追求营业额，而应该看方向，看路线，看是不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改得好！改变了过去那种把顾客当作“陌路人”的经营作风。营业人员要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就不能怕麻烦，图省事，马虎草率，态度生硬，而应该把心贴在工农兵身上，主动热情，耐心诚恳，不怕麻烦，对工作极端负责。

老人赞扬的，何止是一张清单！他赞扬的是财贸战线上斗、批、改的新气象。这样的变化又何止一件。不少商店增设了夜间营业窗，医药商店的营业员学会了兼治小伤小病，还有活跃在崇山峻岭的货郎担，把日用品送到贫下中农手里……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工农兵的好评。但是我们商业工作者不能就此满足。要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先进的要在赞扬声中找差距，落后的要正视顾客的批评意见，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质量。

财贸战线斗、批、改形势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从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在柜台上，在旅社里，在服务行业的一切工作中，才可能切实地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服务行业，一定会不断扫除旧的经营作风，涌现出越来越多体现无产阶级新风尚的动人事迹。

学好学差大不一样

江苏大丰县中学学生 江卓成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学校采取一系列措施，抓了学生的学习质量。许多同学都能自觉地为革命刻苦学习。但也有少数同学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说：“学好学差一个样，反正到时候拿毕业证书，上农村劳动。”

学好学差是不是一样？到农村劳动就不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吗？最好让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现在都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他们当中有许多很受工农兵群众的欢迎，能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能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逐步运用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解决实际问题。但也有一些同学，由于平时没有认真学习，等到劳动中需要科学知识时，要他们做这样不知，做那样也不会，成了摇头派。这怎么能说是“一个样”呢？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深入，各条战线上都需要我们青年人去接



班。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说的“几方面”，我们都要努力做到，不能缺一方面。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要有强健的身体。我们学生每一天的学习，无论是做一篇作文，解一道数理化题目，都是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就拿农村来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越来越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一个学生文化知识学不好，就好像工人大做不好工，农民种不好田，战士打不好仗一样，就不算一个好学生。因为他辜负了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期望，在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为祖国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在旧社会，我们的祖辈、父辈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在文化上也被压在最底层。我们有个同学的爷爷在旧社会连一个名字也没有，更别说上学读书了。想想这些，再看看现在，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革命教师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教我们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知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学习呢？

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一会儿鼓吹“读书做官”，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引诱青年学生走白专道路；一会儿又散布“读书无用”，“劳动不需要读书”，否定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否定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前者用读书来否定劳动，后者用劳动来否定读书，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读书和劳动对立起来。如果我们也认为从事农业劳动就用不着学文化，或者学了文化就不必从事农业劳动，这就上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了。我们必须把要不要为革命刻苦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知识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断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各种谬论，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发扬“燕子垒窝”精神

吉林九台县鸡鸣山公社评论组

我们公社周家五队，原来是个穷队，一千多亩耕地，全是红土包子，一亩打不上百斤粮。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改土造田，把一车车、一担担黑土送到地里。十八年过去了，地里铺上一层三寸多厚的黑土，提高了粮食产量。近三年来，亩产跨《纲要》，集体经济日益巩固，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下，他们仍然坚持勤俭办事。互助组时的十七条口袋，补了又补，有一条补了六十七块，一直用到现在。从互助组到如今，这个队每斤粮食的成本费没超过二分钱，去年只用了一分四厘六。

问他们为啥能这样？一位老饲养员回答说：“高头大马得一把草一把料才能喂起来，高楼大厦得一块砖一把泥才能盖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得有‘燕子垒窝’的精神。”

这话说得在理，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燕子垒窝”精神。列宁说过：“**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大与小，多与少，是辩证的统一。燕子的窝是一口草一口泥，衔了一趟又一趟，才垒成的。丰收的好年成，是一锹一镐地干换来的。没有平凡的小事情，大事业就成了空中楼阁。聚沙成塔，积水成河，一分钱虽少，积少成多，能办大事。比方说，我们公社有一万七千口人，如果每人每天为集体节省一分钱，一年可节省六万二千多元，把这笔钱用到扩大再生产上，能买十五台手扶拖拉机。象“燕子垒窝”那样，逐渐积累，坚持不懈，就会取得很大成绩。

和“燕子垒窝”精神相反，有的人缺东西不愿自己动手解决，喜欢当伸手派。这是懒汉思想。还有的人认为，集体家底子越铺越大，日子越过越红火，多花点多用点坏不了年成。这种人做起事来讲排场，图阔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它和社会主义事业是水火不相容的。“毛毛雨湿透衣裳，杯杯酒喝垮家当。”这儿多花点，那儿多用点，就会削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勤俭节约还是铺张浪费，反映了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勤俭节约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本色，铺张浪费是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决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我们的灵魂。

毛主席教导说：“**要使我们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为“燕子垒窝”精神叫好，就是因为它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不管哪行哪业，都要发扬“燕子垒窝”精神，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奋斗不息，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这样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洪 桥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坚持“**农业学大寨**”，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使农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国家粮食储备在逐步增加，许多生产队也有了一定的储备粮。我国粮食战线形势是大好的。

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绝不能忘乎所以，必须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农业连续多年丰收、粮食产量和储备量逐步增长的有利形势，也要看到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我国的粮食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还是比较低的，就社会需要而言，还是不够宽裕的。只有这样认识粮食形势，才能鼓足更大的干劲发展粮食生产，才能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有计划地把各方面的需要安排得更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吃饭是一件大事，粮食是人人需要、天天需要的。对待这样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要瞻前顾后，细水长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我国粮食虽然还不宽裕，但人民生活都有保障，各方面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解决。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很重要一条，就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的教导，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这是执行勤俭建国方针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也仍然要坚持这样做；即使将来粮食大



大宽裕了，也必须坚持这样做，绝不能有“松松口、撒撒手”的思想。

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不断增加粮食储备，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我们对他们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进行必要的准备。打起仗来，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建国以来，我国大量兴修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增强了抗灾能力，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灾害，每年部分地区有些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用粮、吃粮上，一定要高瞻远瞩，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出发，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丰年一定要想到歉年，丰收地区一定要想到歉收地区，妥善安排粮食消费，努力增加粮食储备，逐步实现“广积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增加粮食储备，一靠增产，二靠节约。早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里，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就一直遵照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把节约储粮当作巩固革命根据地、打倒国内外反动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对节约储粮工作仍然不能有丝毫放松。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人一天省一口，一年就会省一斗，全国就能节省出上百亿斤的粮食。只要大家从思想上认真重视，这是很容易办到的。许多地区的经验证明：日子过紧点，口粮水平较低的地区也能多储粮；稍一“松松口、撒撒手”，即使口粮水平较高，也会前吃后空，储不了粮。我们一定要在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留足种籽和饲料、安排好社员生活的基础上，组织好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抓紧粮食储备工作。能多储的要多储，一时不能多储的也要尽力储一点，积少成多，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要坚持继续革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就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这个政治本色。用什么态度过日子，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还是铺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这决不是生活小事，而是要不要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的大事。如果丢掉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不仅会丢掉大批宝贵的粮食，而且更重要的是丢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不管城市和农村，都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劳动人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优良传统，在节约的原则下，有计划地把生



活安排好，把日子过好，“宁在囤顶留，不在囤底愁”。要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要抓关键人：干部带头把关，节约用粮；家庭主妇淘米下锅，要“算了吃”，不要“吃了算”。抓关键事：婚丧嫁娶、修房盖屋、年关节日，都要提倡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反对铺张浪费和大吃大喝。机关、企业、学校、团体要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政策，狠抓节约用粮，克服一切浪费粮食的现象。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吃饭问题上，我们历来主张自力更生，立足国内。过去，我们靠自己的“小米加步枪”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更要有志气、有决心依靠自己的粮食解决国内需要。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修正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一面增加生产，一面厉行节约，我国早已做到国内粮食自给有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力争今后国内粮食有更多的储备。这就必须在努力增产的同时，继续抓紧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要继续认真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我们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要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都离不开粮食。马克思曾经指出：“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说，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和其他农副产品。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农民每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在安排各项建设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农村提供商品粮的可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地发展。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需要，使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正常发展。如果放松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在国家计划之外随意支用粮食，其他方面的用粮计划就得不到保证，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粮食形势大好，好就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牢记毛主席关于“必须把粮食抓紧”的教导，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抓紧粮食生产，抓紧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使分配和消费得到合理安排。形势越好，我们越要谦虚谨慎，越要注意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在粮食战线上夺取更大的胜利！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

任 为 农

加强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历来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建国以后，毛主席又亲自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了科学种田的纲领。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党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较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群众性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几年来，在农、林、牧、副、渔等方面，较大的科研成果就有三百多项。作物育种和杂交优势的利用，取得了不少成绩，水稻矮秆良种、小麦抗锈品种以及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等已大面积推广。提高土壤肥分的细菌肥料和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技术的发展较快。盐碱、红壤等低产田土的改良和固沙造林等方面，也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农田基本建设和耕作栽培技术的发展，耕作制度正在发生变化，南方的一年三熟制和北方的一年两熟制以及间作套种经验，正在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了发展。所有这些，都对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给农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新的课题。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使它更好地适



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快农业建设的步伐，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基础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科学研究，迅速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一项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显著成效。比如已经大量推广的杂交高粱，产量一般比原有品种增长一倍以上；正在使用的“五四〇六”菌肥，增产效果一般在百分之十左右。可见，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极为密切。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对种子、肥料、土壤、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以及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当前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所必需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农业生产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艰苦工作。要取得这项工作的自由，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探索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农作物是有生命的机体，其生长与发育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并随着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特性，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的发育阶段，对于肥料、阳光、水分等方面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农业科学研究，不断揭示农作物的特点和生长的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条件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运用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自然条件，改进栽培方法，改变作物品种的性能，从而就能在农业生产中逐步争得更大的自由，就能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满足社会的需要。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没有抓住纲，就不能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就不能振奋人民的精神面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是搞不好的；抓紧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要努力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要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抓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同时，抓好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农业科学研究也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离不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充分发动群众，大搞为革命进行科学种田的群众运动，这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农业科学研究的主要经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农业科学本来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亿万农民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是农业科学发生和发展的源泉。离开农民的生产实践，就没有农业科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激发了他们向科学领域进军、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第一个大量推广的矮秆水稻良种“矮脚南特”，是广东省潮阳县农民选育成功的；水稻小苗带土移栽的新技术，是浙江省缙云县农民创造的；农民科学家姚士昌，对花生的生长规律进行了多年的探索，提出了“清棵蹲苗”等先进栽培技术，解决了当地花生增产的关键问题。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科学，人民群众是科学实验的主体。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农业科学才能较快地发展。

在广大农村建立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小组，是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的一种好形式。这种“三结合”的实验小组，来自群众，紧密联系生产斗争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科学实验活动，既有利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又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发掘群众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广泛地建立“三结合”的农业科学实验小组，逐步形成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必将大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湖南省华容县，从县到生产队层层建立“三结合”的科学研究组织，广泛开展科学研究活动，搞了二百多个试验、示范、推广项目，取得了成绩，促进了生产。充分重视群众的科学实验活动，总结和推广“三结合”实验小组的经验，帮助他们培养技术骨干，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必要的试验条件，这是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的。

“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小组，要特别注意吸收老农和知识青年参加，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许多老农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有熟练的生产技能，深知农作物的



习性和当地的自然状况，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热爱集体生产劳动，这是他们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有文化，有干劲，“**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是农村进行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有生气的力量。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只要善于把他们组织起来，鼓励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革命钻研农业科学技术，积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帮助他们把书本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就能使农业科学研究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就能使他们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出贡献。

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各级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的专门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根据需求和可能条件，建立和改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的专门机构，是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起来的。广大革命的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是发展农业科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忽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和科技人员的作用是错误的。我们要在大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的同时，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加强专门机构的整顿和建设，适当地充实人力和设备，使他们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农业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能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执行什么科研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在农业科学实验中作出了可喜的成绩。近几年，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上的许多成果，象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许多优良品种，防止马铃薯退化的有效方法，家畜电针麻醉法等，都是专门机构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经验证明，只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对广大农业科技人员进行路线教育，他们是能够有所发明创造的。我们应当积极帮助广大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研路线，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真改造世界



观，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出贡献。

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专门机构的科学实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紧密联系实际，能及时反映生产的需要，便于集中当地农民的经验，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基础。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机构通过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把群众中十分宝贵但是比较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总结提高，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这就更加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更加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

随着农业生产和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的发展，专门机构的任务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了。既要总结和推广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又要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探讨；既要重点研究当前生产中提出的问题，也要注意对长远发展需要的课题的研究。不断进行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积累科学技术资料，组织学术情况的交流，有计划地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等等，这些也是专门机构所必须承担的。应当了解他们的情况，研究他们的问题，注意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任何一项研究成果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需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农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有生命的物质，而且有的生长期较长，要认识其本质、掌握其规律，就更需要经过长期地、艰苦地努力。“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在农业科学研究中，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对待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一遇失败就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对于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的实践和广泛地讨论去解决。各级农业科技主管部门，应当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加强对农业科学研究的领导，根据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明确农业科学的奋斗目标，并给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一定的条件，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



学习辩证法 改造低产田

湖北安陆县崔兴公社崔沟大队党支部

我们崔沟大队，九百多亩耕地，分布在三座黄土岗上，四条冷浸冲里，条件差，产量低。怎么办？只能根据客观规律，依靠人民的力量去改造自然条件。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具体地分析在生产斗争中遇到的矛盾，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逐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改变了低产面貌。一九六四年以前，我们大队粮食平均亩产是二百三十多斤，总产二十多万斤；去年，粮食平均亩产一千斤，总产提高到七十六万斤。

小塘堰作用不小

原先，我们大队粮食低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严重缺水，一部分土地只能种旱庄稼。根据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改旱地为水田，改一季为双季，是一个增产的门路。这就首先需要改变水利面貌。虽然公社在我们大队修了一个可以蓄水二十多万立方的五口堰水库，但它要供应几个大队的用水，满足不了我们改造低产田的需要。

究竟如何解决缺水的问题呢？我们从第三生产队的实践中得到了启示。在全大队中，这个队水源条件最差，可是水利问题却解决得比较好。他们在一九六四年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本队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修复、开挖小塘小堰六十多个，蓄水十三万立方，相当于大半个五口堰水库，从而扩大了水稻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事实使大家懂得，大和小是相比较而言的，在一定条件下，大与小可以相互转化。大能化小，积小可以成大。我们要看到大水库的好处，但也不能忽视小塘堰的作用。五口堰水库虽然比较大，但是几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分用。这对于用水的各生产队来说，大水库里的



水就成了小水；小塘堰虽小，但是许多个小塘堰的水集合起来，就变成大水。随着生产的发展，普遍需水量大，如果各队都有象第三生产队那样的小塘堰，就会减轻大水库的负担，使小塘堰发挥大作用。大小结合，大水小水连藤结瓜，互相调剂，配合使用，就能较好地改变我们大队的水利面貌。

其实，其他生产队原来也有些小塘堰，但由于认为它小，没有重视它，致使有的长期失修，装不了多少水，有的被毁掉，种上了庄稼。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推广三队办小塘堰的经验，宣传大和小的辩证关系，并且从一九六五年开始，采取“生产队常年兴办小水利，大队组织协作搞突击，当年兴办当年受益”的办法，大搞小塘堰。这样，不到三年，我们大队的小塘小堰，由原来的一百多个，增加到二百多个，可蓄水四十多万立方，相当于两个五口堰水库。这样一来，不仅扩大了水田面积，而且在六、七十天不下雨的情况下，也能够满足我们大队用水的需要。

为了使小塘堰发挥大作用，我们注意小塘小堰的保护、维修、蓄水、保水工作。在大队范围内的四座大山和几十个小山包的周围，我们开挖了五十多华里的拦水沟，那怕下一点小雨，也不让它流失；如果下大雨，我们就用抽水机抽、水车车，把往山下流的水回头灌塘入堰。大家把这叫做“小雨不下山，大雨回头灌，下雨不忘防旱。”就这样，我们积水如积粮，并且尽量做到合理用水，使旱天不早地，旱地不缺水。今年种上早稻以后，一百二十多天没下一场透雨，我们发挥了小塘小堰的作用，仍夺得了丰收，早稻平均亩产达到七百斤。

变“冷浸田”为“丰产田”

水，对于农作物来说，是宝贵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带来害处。“冷浸田”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大队七百三十一亩水田，其中三百五十亩是“冷浸田”。这种田，都在山冲里，常年浸冷水，地温低，泥脚深，不利于水稻发育生长，耕作又不方便，一年种一季中稻，亩产超不过二百斤。

水稻发育生长，需要一定的温度。我们为了给“冷浸田”增温，曾下过石灰、石膏，但这只能使秧苗发一阵青，以后，田里照样是冷浸、锈水、黄秧。产量也



还是老样子。问题在那里？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我们对“冷浸田”作了详细的调查、分析。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崔沟很久前是一条河沟。河沟两边的黄土山，长期被雨水冲刷，流失的黄土填满了河沟，河沟的冷泉、暗溪，长期冒冷水，把黄土泡成烂泥。第二，我们这里有个旧的耕作制度，叫做“冲田不要粪，只要腊水浸”。收割一季中稻以后，把田里灌满水过冬，到第二年再插中稻。结果，腊水越浸越冷，泥脚越浸越深。第三，山区日照少，“冷浸田”本来温度低，让冷水一灌，温度就更低了。这三条，概括来说，第一是田里冒冷水，第二是田里浸冷水，第三是田里淌冷水。由于这“三水”的作用，就形成了“冷浸田”。以前，往“冷浸田”里下石灰、石膏，虽然会产生一定的热度，但远远抵不过冒的冷水、浸的冷水、淌的冷水。所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改造“冷浸田”，就要治理这“三水”。

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改造“冷浸田”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分析、研究，认识到冷泉、暗溪冒冷水是主要矛盾。如果把冷泉、暗溪治住了，不冒冷水了，再解决浸冷水、淌冷水的问题，就好办了。田里没冷水了，烂泥沉淀，慢慢显出硬泥底子。底子硬了，冷水便不会往上冒，时间一长，烂泥也就不再是烂泥了。于是，我们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对田里冷泉、暗溪的来路，采取“结扎”断流；摸不清来路的，就在“冷浸田”的四周，开一米到两米宽的水沟，用来降低水位。沟里的烂泥水，锄不能挖，锹不能铲，我们就用脸盆端，水桶提。用这种办法改造“冷浸田”，一个冬春，需要开三、四次沟。一块“冷浸田”的改造，得经过三年、四年的开沟。我们在坚持开沟的同时，还采取措施，改革旧的耕作制度，不搞“冬泡田”，搞排水渠，挖放水沟，使冷水不串田，锈水排出田，肥水不出田。实现合理排灌，提高了水土的温度。这样年年改造，三百五十亩“冷浸田”已经有三百三十亩变得不冷了，种上了双季稻，亩产提高到八百四十斤。

怎样把“死黄土”翻活

我们大队地处黄土岗上，大部分田的土质都是“死黄土”。我们想，要在这种



田里多收粮食，在解决水利条件之后，就要靠多施肥。一九六八年，有个生产队下了大量化肥，满以为这样可以夺高产。那晓得，搞了两年，不但没有增产，反而把田施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那么怎样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呢？一次，我们到第四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整“育秧田”，觉得秧田土质松软，散发着一种沃香味，而大田的土质板结、死硬，闻到的是一种焦味。我们针对这种情形，进行分析、比较，发现问题正是出在肥料上。“育秧田”的土质，原来也是“死黄土”，因为每年育秧，主要是用家肥。家肥是有机肥，下到田里，使土质变得松软，有蓄水、通气、保肥的作用，时间一长，就把“死黄土”翻活了。“死黄土”田里下化肥是怎样的情形呢？“死黄土”本来粘性重、干硬、肥力低。我们原来用的化肥，又主要是硫酸铵。单纯施硫酸铵会使土壤的灰分养料减少，酸性提高，使“死黄土”更板结。这就说明，要改良土壤，多收粮食，不只是为了肥多肥少，还在于怎么用肥。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我们用肥，必须根据不同的土质，做到合理用肥，如果没有摸清土质、肥性的规律，乱下肥，就会造成浪费，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家肥既然比较有利于把“死黄土”翻活，我们就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广辟肥源，积极发展集体养猪，鼓励社员家庭养猪，既增加了肥料，又增加收入；同时，在山岗上开荒，种上棉花、芝麻、黄豆、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又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各种饼肥。另外，还学习兄弟大队改良土壤的经验，种红花草。为了控制水土流失，不让山上的“死黄土”再冲压农田，我们又在山上种上了松、杉、梨、苹果等各种树木四百多万株。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死黄土”终于被翻活了。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人们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去期求工作的胜利，却可以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我们决心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断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努力实现机械化

——徐州铁路分局车辆段的调查报告

徐州车辆段处在津浦、陇海铁路的交叉口，担负着繁重的客货车检修任务。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段以路线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完成了二百余项革新项目，基本上实现了修车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使这个具有六十四年历史的老段换了新貌。

过去，他们修车大都是靠手工；现在，四十道主要工序有三十二道使用了机械操作，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过去平均每天修八辆车，现在平均可修十六辆。这个段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在修车任务比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的情况下，年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段长期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修车能力提高得比较慢。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修车任务逐年增加。尽管全段干部、工人经过了一番努力，但是因受人员、设备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远不能适应运输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州车辆段的主要干部深入到劳动强度较大的班组参加劳动，调查研究，召开老工人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广大工人纷纷要求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改变已经落后了的生产方法。工人同志们提出，按照



“鞍钢宪法”指引的方向，开展技术革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向技术革新要人力、要设备、要材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扭转当前生产的被动局面，同时还可以减轻劳动强度，使社会主义生产技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问题一提出，大多数同志积极拥护。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当前任务重，人手少，设备旧，靠现有的条件不可能搞好技术革新。针对这种思想，他们组织老工人回忆解放以来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的情况，使那些有顾虑的同志受到了教育。解放初期，这个段缺乏设备，工人同志们发扬当家做主的高度革命责任感，自己动手修复旧设备，制造新设备，造出了丝杠压机、夹板锤等设备，生产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工人们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在完成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自制了悬臂钻、剪冲机、空气锤等机械设备，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工人们说，革新就是革命，成功就得斗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传家宝。过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工人，也一定能靠自己的双手，搞好技术革新，尽快地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

认识提高后，这个段对技术革新作了具体安排，成立了有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并且指定专人抓这项工作，技术革新很快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一九七〇年，这个段在提前七十二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进行了十项技术革新的会战。例如，为了解决修车主库起重能力不足的问题，他们自己动手搞风动架车机。这项工程规模较大，材料较缺，再加上安装这种设备需要在半米厚的水泥地上往下打四十八个深坑，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有不少困难。但是，他们迎着困难闯，创造条件上，苦干加巧干，硬是用大锤和钢钎打出了四十八个基坑。检修车间机械班的工人坚持在破车床上搞革新，加工改造，用车床代替镗床，镗好了几十个大风缸，解决了革新中的关键问题。经过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四十五天的奋战，使风动架车机很快投入了生产。



坚持群众路线 实行“三结合”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徐州车辆段党委体会到，开展技术革新，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有个时期，有的车间认为生产任务重，怕误了生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只是抽调几个人去搞革新，效果不显著。段党委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教导，回顾本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文化大革命前的工艺革新，特别是升降煮洗池失败的教训，进行了分析。一九六五年，这个段自己搞了个煮洗池，由于当时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没有走群众路线，工艺流程不合理，浪费了国家一万二千余元。他们接受教训，在这次技术革新运动中，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结果出现了一个“人人动脑筋，班班搞革新”、“一处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的生动局面。例如在搞高压冲洗机这项革新时，每当遇到疑难问题，干部就一面亲自到现场去，和群众一起研究，失败了总结教训继续干，不断改进；一面发动全段职工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高压冲洗机在装配时，有三千多个喷水龙头和弯管需要焊接，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如果光靠革新小组的一台电焊机来干，一个月也干不完，势必影响整个革新的进展。党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广泛发动群众，人人献策。各个车间班组热烈响应，积极配合支援，全段二十二台电焊机的工人主动想办法，抽调十三个同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结果只用了四天就完成了电焊任务。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原来需要将近一年才能完成的革新项目，不到五个月就完成了。

坚持从生产实际出发

要搞好技术革新，必须克服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贪大求洋的错误倾向，坚



持从当前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尊重科学，合理安排。这个段在技术革新中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创新与改造相结合，首先抓好对旧设备的改造，不断提高旧设备的生产能力。检修车间主库的一号天车，由于构造不合理，起重能力达不到原设计十吨的要求，影响生产，需要改造、大修。他们就自己动手，用了二十七天时间，进行修理、改造，不但使起重能力达到了十吨，还为国家节约资金三万余元，使这台老设备换了新貌。

土与洋结合，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这样做可以少花钱，多办事，上马快，效果好。轮轴班过去是用砂布进行人工除锈，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这个班的工人，用废料制成了一台磨轴身机，不但保证了产品质量，提高工效三倍，减轻了劳动强度，还为国家节约了很多砂布。工人们说：“土货不能看外表，高效适用就是宝。”

当前与长远结合，以解决当前生产中的问题为主。过去修车主库设备不成套，工艺流程不合理，影响生产。他们在发动群众对工艺流程进行革新中，全面考虑当前生产的需要和今后生产的发展，在对旧工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厂房设备，进行了全面安排和合理布局，改革了旧的工艺路线。同时又发动群众自己制造出了大型高压冲洗机、电动转盘等设备，配套成龙，初步形成了台车冲洗分解、台车组装等六条流水作业线。这样，既便利了当前生产，又为今后大规模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州车辆段认识到，在技术革新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他们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虚心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向机械化、自动化的广度和深度继续进军。

江苏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报道组



介绍一个清洁工人办的化工厂

秦皇岛市海港区部分清洁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办起了一座小型化工厂。一年多来，他们利用附近大工厂排出的废煤焦油渣生产了油类、酚类、炭黑、沥青焦、硫酸钠等二十多种产品，变害为利，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七一年，清洁工人们为了支援农业生产，把粪便交给生产队直接管理，这时，他们想起清扫环境卫生时，常常发现有的工厂将大量含有煤焦油和其它成分的过滤水同焦渣一起扔掉，浪费了国家资财，又污染海水，影响环境卫生。为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他们提出：大搞综合利用，从废煤焦油渣中提制油类和化工产品。可是，有少数人说：“烧煤出渣，洗煤出末，事在必然，这些渣渣末末除不除关系不大。”针对这种思想，党支部组织工人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引导大家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认识搞好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会产生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渣，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可能根本解决“三废”问题；大量的废水、废渣、废气污染空气，毒化江河，影响人民健康，危害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的公害。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对废水、废渣、废气，应尽可能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增进人民健康，增加社会财富。清洁工人深受旧社会的苦，最知新社会的甜。他们说：“我们应该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做出贡献，过去我们掏粪便搞环境卫生，现在要清理‘三废’，搞大自然的卫生，为人民除害兴利。”于是，他们决心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开展综合利用，使危害人民的废物，变为造福人民的资源。

经过调查，他们对废煤焦油渣从利与害两个方面算了账。一吨无水废煤焦油渣，大约含酚百分之十五，含油百分之三十五，含沥青百分之五十。酚和沥青都是有毒物质，一吨废煤焦油渣中所含的酚，就会严重污染一个一千万立方米的水库。假如不及时处理，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就会对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造成危害。但是酚、油、沥青等又是工农业生产宝贵的原料。油类，可作燃料；酚类可



做合成纤维、染料、树脂、医药、农药和炸药的原料；沥青广为工业生产所需要。如果把成百吨、千吨的废煤焦油渣综合利用起来，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物质力量。“害”与“利”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只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废”物就可以转化为宝贵的财富。

经过学习，大家明确认识到，“三废”的综合利用是直接关系到工农关系，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做的工作。清洁工人们表示：一定要从革命利益出发，搞好综合利用，为子孙后代造福。

在综合利用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一是文化低，不懂技术。二是没有炼油炉、滤油机等化工设备。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思想有些动摇，说：“咱们对化工生产一窍不通，搞不了那行当！”大多数同志则坚决表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懂技术干中学，没有设备自己造，只要决心干，就一定能从废渣中取出宝来！”

“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鼓舞着他们前进。他们坚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大胆创造，由不懂到懂，由不会到会。提炼油的技术，就是经过多次试验才掌握的。第一次搞了一个土试验炉。点火试验的那天，正值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工人们顶着风，冒着雪，坚守在炉旁。冷了，就围着炉子跑几圈；饿了，就吃几口干粮。一直搞了半天一夜，蒸馏出点液体，不知道是油，白白地给扔掉了。他们并没有灰心，紧接着搞第二次试验。用土办法区分油的种类，用打火机能打着的，就是汽油，煤油灯点着了、烟子小的，就是煤油；烟子大、灯花长的，就是柴油。这样，虽然提炼出几种油，但纯度低，质量不合格。为了提高油的质量，他们又进一步摸索蒸馏的规律，改进精馏和过滤装置。结果用自制的土精馏柱代替精馏塔，成功地提取了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各种油类。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他们在提取各种油类以后，并没有停止不前，又从油类提取各种酚类产品。开始，他们对酚根本不认识，更不知怎样提取。到兄弟厂参观学习后，按照人家用火碱和硫酸的配方进行提取，结果一点酚也没脱出来。他们琢磨，为什么用同样的配方人家能脱出酚而自己却脱不出来呢？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现由于油的粘度和含量的不同，用火碱和硫酸的比例也不一样，他们根据油的特点，适当改变配方比例，逐步掌握了脱酚的规律。



缺少设备，他们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制造设备和工具。在修建炼油炉时，需要将两块钢板窝成锅形，有的人图省事，建议到外厂加工。大多数工人不同意这么办，说：“让人家加工，事是省了，钱却费了，我们应该一分钱顶几分钱用。”十几名青年工人在一位老铁匠的组织下，挖地为炉，生火锻烧，轮流用大木锤打了三天，终于把钢板窝成了锅形。他们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四万多元的资金，就添制了各种必需的设备，建起了一座小化工厂，为国家节约投资几十万元。

一年多来，这个厂紧紧依靠群众，大搞废煤焦油渣的综合利用，从无到有，从单项生产到多项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综合利用，改善了环境卫生。过去废煤焦油渣堆积在工厂院内，气味难闻，污染水源，使附近的水都不能饮用。经他们清除了上千吨的废煤焦油渣以后，大大减轻了污染，净化了环境，深受群众的欢迎。

综合利用，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他们从废煤焦油渣中提取了汽油、煤油、轻重柴油、防腐油、沥青焦、粗酚，又从粗酚中精馏出苯酚等产品，最近又用沥青焦生产石墨电极。生产出的产品达六百多吨，价值二十多万元。这些化工产品用途较广，其中有些产品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急需物资。

综合利用，锻炼了一支技术队伍。清洁工人成了化工工人，他们由不懂到懂，现在一般都熟悉设备性能，掌握本工序的生产技术，有些人还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化工生产的理论知识。煤酚皂溶液车间的六名老工人，年长的七十三岁，年轻的也四十六岁了，掏粪三十多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就从什么叫百分比开始学起，逐步学会了煤酚皂溶液的配方配比，并生产出符合技术标准的产品。这个厂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工人们就努力学习新技术。生产发展了，技术知识也就随着丰富和提高。

生产的发展没有止境，综合利用也没有尽头。这个厂的工人决心把已取得的成绩当成新的起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进一步搞好综合利用，兴利除害，争取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河北秦皇岛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文 化 战 线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 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杨 荣 国

殷、周是奴隶制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则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

在这一社会急剧变革当中，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是不断地发展着：如公元前五五〇年，陈国有筑城的人民的暴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五二〇年，周王室中的“百工”叛离王室（《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又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工奴围攻卫庄公（《左传》哀公十七年）。公元前四七〇年，卫国工奴拿着工具向公室进攻，赶走卫侯辄（《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当时还有些被奴役者聚集在葭苇丛密的地方，打击郑国的统治者（《左传》昭公二十年）。在晋国，则人民听到国君有所命令，就象敌人追来似的逃跑了（《左传》昭公三年），就是说，以逃亡来对抗。

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力量推动下，土地所有制亦在变化。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全属王族所有，到春秋中期后，由于私家势力增长，私有土地的出现，在鲁国于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不得不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这从当时来说，自是一大变革。由是出现了地主和佃农，还有由自由民转化来的自耕农。于是个体经济得到开展。

由春秋以至于战国，一方面被奴役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又有所发展，如以跖为



首，在秦国所发动的奴隶起义^①，就有数千人，对当时各诸侯国的奴隶主贵族，给以沉重的打击。（《史记·伯夷列传》、《庄子·盗跖》均有记载此事）因此，跖在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可见跖在当时社会上起着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当时人民耕种豪民土地，缴纳地租，这说明当时的封建制生产关系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奴隶们从斗争中获得了解放，有的则成为雇农，所谓“卖庸而播耕”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力，受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剥削的雇农。

这一变革的形势，致使原来在殷、周用以维护政治上等级隶属关系和榨取奴隶劳动的典章制度，自也无法维持，从而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至于战国，适如顾炎武所指出的，是“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这是奴隶制统治无可挽回的总崩溃的形势。

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在这过渡中，有奴隶们之争取解放，有新兴力量的抬头，他们一齐起来，不断地向奴隶主阶级进攻，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情势下，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内，亦开展了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适如列宁所指出的：“**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亦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

当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代表的，是儒家的孔丘和思孟学派。而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的代表则有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至于荀子虽属儒家，但从他的哲学观点、他的政治思想来看，基本上是当时新兴力量的思想代表。

从儒法两家的思想斗争，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促进新制度的发展，还是维护旧制度；是适应历史的发展、为新兴阶级服务，还是把它拉向后退、取法什么“先王”；是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而倡导法治，还是顽固地维护旧制度的所谓“礼治”；是从当时实际斗争观点出发，针对现实而解决问题，还是以主观观念去规定发展中的客观现实；这在当时进步阶级和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总是



有所表现的。所以，法与儒在思想上的论争，是反映了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代，法与儒思想斗争的实际：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生当春秋后期。由于当时奴隶的不断暴动和新兴力量的抬头，维护奴隶制统治的所谓“礼治”，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因之而有企图改变旧制度的思想的萌芽。公元前五三六年，郑人铸刑书（法的条文）；公元前五一三年，晋人铸刑鼎，就是例子。但当郑人铸刑书时，晋国保守分子叔向认为“刑书”公布了，就会引起奴隶们的“争端”，就会“征于书”——根据“刑书”和贵族作斗争（《左传》昭公六年）。孔子对晋人铸刑鼎更是激烈地反对，认为成文刑法，把奴隶与贵族间的关系怎样，写成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使大家都知道，这样，怎么能够“尊贵”——尊重贵族的奴隶制统治呢？这不是弄到“贵贱无序”，不成其为奴隶制国家吗？（《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以孔子坚决站在奴隶主立场以维护旧制度。

孔子要维护旧制度，还表现在他在鲁国代行宰相职务时，一上台就把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罪名是：一、“聚徒成群”——聚众结社；二、“饰邪营众”——鼓吹邪说；三、“反是独立”——淆乱是非（《荀子·宥坐》）。当时，齐国的简公对奴隶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奴隶们对他恨之入骨。齐国的田成子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情势，从改变奴隶制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田成子“复脩釐（读僖）子之政”，釐子“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给予或贷予）民以大斗”（《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以“民爱之”（《史记·齐太公世家》）——为当时人民所爱戴。可是，孔子对此，却顽固地站在奴隶主立场，要鲁哀公出兵讨伐田成子（《论语·宪问》）。

孔子尽力于维护奴隶制的旧秩序，如他倡导的中心思想“仁”的核心，就是要“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他见到当时新兴力量的进攻，如鲁国的季氏不是和孟孙氏、叔孙氏一道把公室三分了吗？且季氏从三分公室中，把所分得的土地，改变生产方式而经营，即采取征收地租的办法。可是，孔子对之却极为不满，多番指责季氏，且认为季氏这种分公室的行为与改革，是极为“不正”的举动②，是不能克制自己的具体表现。又见到当时奴隶们之争取解放，说什么“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狎（排挤也，亦即有推倒之意）大人（指奴隶主阶级），侮（辱也）圣人（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之言”（《论语·季氏》），认为这是不守中庸之道，胡说什么“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是“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即长期以来，被奴役的人民，都在反对奴隶主的统治，很少能守中庸之道；而奴隶们之不能守中庸之道，就是由于季氏等不能作出榜样，克制自己，故导致奴隶们有越轨的行动，从而把“礼治”破坏了。所以他提出要统治者氏族中人，从克己中以引导到所谓“民德归厚”，提出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以恢复到“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的“礼治”局面（《国语·鲁语》），就是说，恢复奴隶制统治的秩序。

孔子讲“仁”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宣扬“孝悌”之道，认为这是“仁之本”。其目的，是想使统治者氏族团结得很好，从而氏族贵族的统治就可获得巩固。那末，就可导致奴隶们趋于厚道——不致反抗斗争，“犯上”、“作乱”的行为就不会有了。这是孔子讲“仁”的另一主旨。

孔子为要维护奴隶主的统治，他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胡说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论语·季氏》）。并认为“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即上等人的才智与下等人的愚蠢是先天决定了的，不可能改变。他以受天之德自命，所谓“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就是指责他是以挽回奴隶制的颓势为己任。他还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提出所谓“正名”。从孔子看来，名分最重要，由各级奴隶主以至被奴役的人民，都要各守本分。如“礼乐（政令）征伐（军令）”应该“自天子出”——要由周王掌握着最高的政治军事权力，才是“天下有道”；但当时却是“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由家臣掌握一国的最高权力，那就是“天下无道”，社会秩序大乱了（《论语·季氏》）。实际上，这是当时氏族贵族没落、新兴力量抬头的具体标志。同时，孔子为要做到“庶人不议”——被奴役人民没有反抗的呼声，亦要从“正名”中予以解决，企图把已经变革了的社会现实倒退到原来规定的名分。

孔子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要人们脱离实际，去作所谓“内省”的功夫。因为人们如果接触社会现实，自容易发现矛盾，与氏族贵族展开斗争。历来唯心论



者都宣扬脱离实际，其反动用意就在于此。

商鞅（？——前三三八年）的政治主张同孔子是对立的，他接受了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对吴起在楚国的“废公族”和“明法审令”的主张自亦受有影响，是有所属意的。

因此，商鞅适应当时这一发展情况，本着法家的精神，反对“法古”，反对儒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在秦孝公面前，和甘龙、杜挚等保守分子辩论要不要变法时，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就是说，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立法——应当“各当时而立法”（《商君书·更法》）。

另一方面，商鞅反对儒家宣扬古代奴隶制的礼乐，认为这是“淫佚之征”——把人引向邪路，又反对儒家为了维护奴隶制统治而谈的“仁”，指出那是“过之母”（《商君书·说民》）——是罪过的总根子。因为儒家所宣扬的所谓“仁义”、“孝悌”、“诚信”以及学习“诗书”等（《商君书·靳令》），都是在于维系统治者氏族的奴隶制统治。他认为在当时作这种宣传是有极大的弊害，是开历史的倒车。

所以商鞅的改革方案，首先宣布废除榨取奴隶劳动的“井田制”，由是对当时“井田制”的残余形态的经界作了彻底的摧毁；又从肯定私有制中，使人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这适应了当时地主经济的开展。马克思说过：“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哲学的贫困》）商鞅变法亦正是表明这一点。同时，他还提出了耕战政策，就是“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努力从事耕织，从而获得高产的，原来是奴隶身分，就可获得自由，使奴隶们有获得解放的机会，从而导致了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个体经济的开展。反过来，如果还象奴隶制社会一样，以城市经济为主，以奴隶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对于从事农业生产而不积极努力的，即使是自由民身分，也得成为奴婢。在攻战方面，如果为国家打仗，立有军功的，还可以受上爵，取得政治待遇；如果违反国家利益，从事私斗的，则要根据罪行轻重给予处分。所以商鞅指出：“民之喜农而乐战”，则“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商君书·壹言》）。另一方面，他“贱游学之人”（同上），因为当时的“游学之人”，大都企图挽回日趋没落的氏族贵族的奴隶制统治颓势，如儒家孔孟之周游列国，目的就



是如此。而商鞅所贱的，亦就是这些人。

同时，只要人民务农，便鼓励其开垦荒地，并凭自己的力量能耕多少，就耕多少。还规定“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这些是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中农业个体经济的开展。根据《战国策·赵策》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牛耕积谷，水沟通粮，这当是商鞅对于牛耕的提倡和鼓励，从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

商鞅的耕战思想是唯物论的观点，从实际斗争出发，它与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对立的。孔子反对学农学圃，反对参加劳动，而倡导主观唯心论的“正名”，所以当时农民长沮、桀溺骂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尤为关键的是这一观点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各自阶级立场的不同，对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是促进还是促退，两相对比，不是很清楚的吗？

商鞅是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立法的，他之“刑无等级”，就是“法不阿贵”，就是为适应地主势力的抬头，瓦解氏族贵族的奴隶制统治，所以不管卿相、将军或大夫，只要犯了国法或国禁，就应该和“庶人”犯法一样的给予处分（《商君书·赏刑》）。这种措施实际上就是对儒家宣扬“刑不上大夫”的批判。

一方面人民从耕战中可以获得“爵秩”，取得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规定即使是宗室贵族，假使不是从攻战中取得军功的，也不能获得“爵秩”，这实际上也是打破氏族贵族的统治。

同时，商鞅为了瓦解当时氏族贵族的奴隶制统治，而又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开展，鼓励在其他诸侯统治下的奴隶逃亡来秦国，从事农业生产，使之有田可耕，有房可住，这就是他规定的“利其田宅”——公田公宅归其私有。这一战略思想，他说得很清楚，就是“以草茅之地，徕（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农业）”。这样，平时减少了敌人的劳动力，战时使敌人缺少壮丁。这种“损敌”的行动，应“与战胜同实”（《商君书·徕民》），而秦国却因之而发展了农业生产。

与商鞅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就是儒家的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三九〇——前三〇五年）是子思的门徒，而子思（约与墨子同时）就是孔子的孙子。

子思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他对当时奴隶们的造反和新兴力量的进攻，



很有反感。他认为这是“小人行险以徼幸”（《中庸》第十四章），是“反古之道”，违反了孔子倡导的“中庸”的意旨。而其所以如此，他认为就是由于“不诚”所致，因之要向内面作功夫，要“慎独”，这样诱致人们脱离现实的斗争，从而好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向所谓“宪章文武”的道路上走。

到底孟子和子思是一脉相承，是叫人取法所谓先王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认为“五霸”^③是“三王”^④的罪人，现在的诸侯就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又是现在诸侯的罪人（《孟子·告子下》），这样一代不如一代。其所以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他认为这些人接二连三地破坏了巩固殷周奴隶制的“礼治”，是有乖于孔子之道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在那里开历史的倒车，妄图搞奴隶制复辟。

至于他的所谓“仁”的实际内容：他认为“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要把被破坏了“井田制”的经界重新匡正过来。他认为当时某些“暴君”、“污吏”（这当是指秦孝公、商鞅一班人），把经界破坏了，如果经界已正，就能回复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所谓“礼治”局面（《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除指责商鞅之从攻战中以求得统一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服“上刑”——应该处死外，而对商鞅的开垦荒地，任民耕种的办法也认为是犯罪，亦应加以处分（《孟子·离娄上》），从而他认为“善为战”的是犯了“大罪”（《孟子·尽心下》）。

同时，从他所谈的“仁”、“义”来说，是有阶级内容的，他认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所以他的仁义就是“亲亲”、“敬长”，即是说通过“亲亲”和“敬长”来巩固统治者的氏族，巩固氏族贵族的统治。因之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仁”与“义”都是维护统治者氏族的，而商鞅之反对仁义，反对“亲亲而爱私”，亦就是见到了当时儒家宣扬“仁义”的反动性。

商鞅从实际斗争出发，倡导农战，以适应当时社会的变革，孟子却叫人从主观观念出发，关在房子里向内面做功夫，去“存心”，“存夜气”，来阐发上天所稟赋的所谓“善性”，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同时，孟子还认为商鞅一班人倡导法治，进行改革，就是不“以仁存心”，不“以礼存心”，从而破坏了奴隶制国家的旧秩序。所以他叫人从自我修养中做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以达到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反动目的，挽回当时氏族贵族奴隶制统治的颓势。所



以汉代就有人指斥“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盐铁论·论儒》）。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前二三二年）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前二三八年）是儒家，所以荀子也谈“礼”。可是，他所谈的“礼”与儒家传统所谈的“礼”有区别，而其所以会有区别，就是他的思想中受有当时法家思想的影响。因此，荀子所认为的“礼”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应该“断长续短”，作重新分配。所以，他的“礼”带有“法”的味道，就不是“礼不下庶人”的“礼治”。他说过，“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另一方面，他主张“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这和商鞅之倡导“制土分民”（《商君书·徕民》）是一致的。因为“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吕氏春秋·审分》）——这就是说，不致怠惰迟延而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实际上，就是促进当时发展中的封建社会的个体经济之开展。他是重视农业发展的，认为“强本（指农业）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所以他这些主张多少与商鞅有共同点。

特别是，他对“天命”说的批判，不仅否定有所谓“天命”，否定天有意志，认为天只不过是自然之天，一切天体的变化，只不过是自然的现象罢了。既然天是自然，天体的变化是自然的变化，那末，人以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征服它的。自殷周以来，氏族贵族的奴隶主统治者不都是说他们取得统治权力是天命的吗？所以荀子否定天命说，在另一方面说就是对氏族贵族奴隶制统治的批判。同时，否定天命说，而认为人定胜天，这实际上就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和进步力量的一种鼓励，要他们“敬其在己者”，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同自然界和腐朽力量斗争中取得胜利。

这些观点，是多少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当时的总趋势，就是有旧的氏族贵族的没落，有奴隶的争取解放，有新兴力量的抬头和发展。

荀子是反对“法先王”的，而子思、孟子却倡导“法先王”。从荀子看来，这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是欺骗与愚弄群众的，因之，他倡导“法后王”。他认为如果“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荀子·非相》），意思就是说，要从现在的情势出发，取法当今之主之倾向改革的。因此他说，要“审其所贵君子”（同上）。



另一方面，他认为所谓“圣人”不是什么天生的——“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是后天实践和学习的积累。一句话，就是不承认有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或“超天才”，这与思孟学派强调有所谓先验的知识是根本对立的。

到了他学生韩非的手里：

韩非从发扬荀子思想之积极部分中，而成为李悝、商鞅等前期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对孔丘及其思孟学派的思想又作了进一步批判。

一、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则“言必称尧舜”。韩非反对“法古”，认为这样“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谈什么过去某些统治者的“已治之功”（《韩非子·显学》），这是极为反动的。就是说，不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实际出发而解决问题，一味宣扬古代如何好，要以古为法，这实质是叫人走回头路，是在于复辟古代的奴隶制。同时，尧舜的事迹到底如何，并不能肯定，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而去宣扬它，这是“非愚则诬”（同上）——不是愚蠢，就是诬蔑，是不合事实的。

二、孔子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而倡导“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孟子因之而宣扬“仁义”，认为可以从“亲亲”、“敬长”中以巩固氏族贵族的奴隶制统治。所以韩非大力反对，认为这样谈“先王之仁义”，是无益于当今之世，而应该“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同上）。就是说，应当实事求是，走当今的道路。

因之，他认为应该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应该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这就是说，不应当有形而上学的观点，没有什么永恒的道理。古代的道理用之古代可能是对的，但用于现代就不一定对了，应当根据当前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制定一切。因此，韩非的“立法术，设度数”，是在于“利民萌便众庶”（《韩非子·问田》）。怎样“利民萌便众庶”呢？就是说，被奴役的人们不论如何卑贱，是在山林藪泽从事农业活动也好，是关在监牢里的也好，或者是在做厨务做牧羊看牛等类工作的也好，只要他有能力，就要解放他，举他做事（《韩非子·说疑》）。这就是他所说的，要从耕战中，“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韩非子·六反》），也就是说，要有利于新兴势力的抬头。

因之，在另一方面，他主张“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废先王之教即是废除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礼治”，而认为应当“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应当推行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法治。法治的好处就是“法不阿贵”——不站在氏



族贵族一边，替氏族贵族统治者讲话。因为在法治之下，“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韩非说：“使民以力得富”，这也就是说，人民应当相信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致富，这实际上就是对儒家天命说的否定。氏族贵族统治者不是自命为天命的吗？他们的富有，不是说成是天赋的吗？孔子不是说“得之不得”，“有命”（《孟子·万章上》）吗？这样，被奴役的人民所遭受的奴役也自是由天命所支配了的。而韩非从否定儒家的天命说中，承认人民可以从耕战中，以力致富，以事得贵。所以他说“当今争于气力”，“今之争夺，非鄙也”（《韩非子·五蠹》）。另一方面，他认为“富国以农”（同上），以农业为根本。故他主张垦荒地，去草生粟（《韩非子·八说》）；同时，他反对“趋末业”——从事商业。而当时从事商业的，多数使用奴隶，如刁闻以“桀黠奴”便是例子（《史记·货殖列传》），这既有害于被奴役人民争取解放，也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当时促进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开展是有利的。

由上看出，在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儒法两家在思想领域内斗争的尖锐激烈，这实质上就是当时新兴力量对日趋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就是说，是促进新兴力量的发展，还是顽固地维护旧势力——维护日趋崩溃的奴隶制。李斯（？——公元前二〇八年）本着法家精神，辅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如当时属于儒家的博士齐人淳于越就一面歌颂“殷周之王千余岁”，一面攻击当时朝政是“事不师古”。李斯从法家立场出发，揭穿了淳于越“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史记·秦始皇本纪》），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实质。因此，这场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继续。至于秦始皇之取得统一以及他所采取的有关厚今薄古的某些措施——对诗书，对儒家的孔子和思孟学派所持的批判的与否定的态度等等，这从当时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斗争来看，就是很清楚了，他是适应了时代——是沿着法家的道路前进的。

注：

- ① 《汉书·贾谊传》贾谊吊屈原赋云：“谓随（下随，汤之廉士）、夷（伯夷）涸（浊也）兮，谓跖、骄廉。”“李奇曰：‘跖，秦大盗也。楚之大盗为庄跖。’”
- ②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 ③ 〔五霸〕指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
- ④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

李 炳 淑

我虽然是党培养的一个青年演员，十四岁就开始学戏，但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扮演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从演才子佳人到演江水英，不能不经历一场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思想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考进了安徽宿县京剧团。由于文艺黑线的影响，剧团里谈不上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要损人可以把你损死，要捧人也可以把你捧上天。有人就对我说，“你这块料就是好角儿，你要有好老师就来采了。”我也自认为是块“好料”，所以一面拚命学戏，一面后悔进了小剧团。从此，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坏思想就象霉菌一样开始在我脑子里安上家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我被送进上海戏曲学校。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下，学的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什么“地毯里出洋房”，“一招鲜，吃遍天”，“唱好了，吃蹦虾仁；唱不好，吃黄连汤，苦一辈子”，这类反动思想可以公开宣扬。在艺术至上、业务第一的背后，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治。文艺黑线要把我培养成为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尖子”，贯彻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尖子”。这个“尖”冒得越高，就跟工农兵，跟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离得越远。

我刚进戏校的时候，作风还比较朴素，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还看不惯。可是慢慢地，从看不惯也变为看得惯，最后自己也学会了。本来我穿的衣服都是家里寄来的，后来却嫌妈做的衣服太“土气”了。起初我在政治上还要求进步，半年以后就入了团。可是这点政治热情不久也淡薄了。心想还是业务最要紧，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所以那时就只顾学戏，在舞台上演才子佳人，在生活中就模仿什么“夫人”的“高贵”，“闺秀”的“风度”。有的同志忠告我：“你变了，变得洋气了。”我还强辩：“怎么变了？我不过是跟着走罢了。”坏就坏在这“跟着走”三个字。跟



着谁走呢？“跟”的是文艺黑线，“走”的是资本主义邪路。

一九六四年，伟大的京剧革命开始了，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诞生了。对于文艺战线这一场深刻的革命，我当时并不理解。上海青年京剧团（我在一九六一年被分配到这个团）是文艺黑线严加控制的一个单位。走资派搬来了田汉所谓的现代戏和传统戏“两条腿走路”的反革命方针，对抗京剧革命。为了装潢门面，他们也不得不排演一些现代戏，但暗地里却对我们说：“老戏不能忘，将来还是要演的。”实际上就是准备着有朝一日反攻倒算。而我那时根本不懂，演什么样的戏的问题，就是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我以为，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演给工农兵看，就算是为工农兵服务了。刘少奇及周扬一伙就是这么说的。一九六〇年我们下农村演出《三不愿意》，为了使农民听得懂，还特地用上海话唱，结果贫下中农根本就不要看这种庸俗无聊的东西。

在京剧革命的推动下，我虽然也希望能演一些革命现代戏，可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演现代戏也演不好。记得有一次排《审椅子》，因为从来没见过女生产队长是什么样儿的，只用了半天时间，到农村找了个女队长，看了看她的举止神态，听了听她的介绍，就算是“下生活”了。这怎么能塑造好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给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整个文艺战线的方向、路线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和世界观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或者说就自觉地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了。思想革命，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由别人来代替的。革命的道路还得自己去走，自己亲身去实践。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开始认识到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是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的必由之路，也想到自己是在红旗下成长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养大的青年演员，应该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道路。但是真正要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老路走惯了，走新路就会不习惯。而革命的道路，因为要不断革命，就决不会是舒舒服服、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着斗争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也造了文艺黑线的反。但是造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就不是那么自觉了。正因立足点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所以就抵挡不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的和右的各种谬论的影响。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也不能正确对待。反而一碰钉子就“逍遥”起来，曾有一度，功也不练了，嗓子也不吊了。我还对自己作了个“分析”：演铁



梅吧，年龄太大；演阿庆嫂吧，不是那种料。大嗓子没有，武功不会，反正是希望不大。我开始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被分配到《龙江颂》剧组的。这同我所要扮演的江水英，当然是相矛盾的。

我还曾错误地认为，演现代戏要比演旧戏容易得多，只要跟生活中一样走路说话就是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排演《龙江颂》的时候，一上舞台，竟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脚步怎么跨，觉得头脑空空，茫无头绪。过去演旧戏，只要照老师教的一套程式依样画葫芦，谁也不会来考究你究竟演得象不象，因为谁也没见过古代的才子佳人是什么模样的。现在演江水英，可得根据现实生活和剧本的规定去创造。英雄人物江水英是什么样儿的，广大观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心里都有个“谱”，离了这个“谱”，走了样，他们就通不过。但是这个“谱”，在我心里却是一盆浆糊。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由于长期脱离工农兵，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我既不了解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心中也没有他们的感性的形象，怎么会不感到空虚呢？要改变这种局面，化空虚为充实，逐步缩小自己同英雄人物之间的思想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我们剧组先后五次下农村。我逐步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长期”、“无条件”和“全心全意”是最要紧的。而要做到这三条，关键在于有没有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自觉要求。这种要求当然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从不自觉到自觉，需要一个痛苦的磨练的过程。

记得第一次下农村，时间不到一个月，因为是带着一种被动的精神状态下去的，因此在劳动中总是怕脏，怕苦，怕累。还一心想找个“模特儿”，可是女干部只有一个女民兵队长，觉得跟江水英也对不上口。这样的下生活，自然收获不大。

真正开始触动我的思想，使我觉得收获比较大的，是三次去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葛隆是上海郊区有名的先进大队。我第一次去葛隆，领导上就关照要作长期打算。而我因为缺少这种思想准备，开头总是别别扭扭的。但是，贫下中农的光辉榜样毕竟在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时间一长，几度来回，和贫下中农接触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例如在“双抢”的时候，贫下中农早晨天不亮就出工，晚上挑灯夜战，几乎有使不完的精力。问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干劲，他们回答说，为革命种田，宁可自己受点累，也不能浪费集体一颗粮，影响国家



计划。这朴素的语言，包含着多么高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比比自己，每天劳动只不过几个小时，贫下中农又总是把轻活让给我们，还觉得很辛苦，差距是太大了，自己确实是太娇气了。这种劳动上的差距，不正是思想上的差距的表现吗？

过去，我每次下乡总怕自己晒黑了。可是，和贫下中农共同生活和战斗一个时期，就慢慢觉得在劳动中晒黑了皮肤，锻炼了思想，是一种光荣。后来，我又进一步体会到：贫下中农不但形象是美的，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想品质更美。

这里且说说我从一位女支部书记身上得到的感受。这位同志是在贫下中农中土生土长的，没有“官”的样子。葛隆的贫下中农都把她当作贴心人和领路人，有事都愿去找她解决。工作忙，会议多，但她从不脱离劳动。她对队里的家家户户都很关心，对后进群众更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做思想工作。她很善于团结同志。有一位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她，而且反对错了，但她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帮助和团结这位同志一道革命，使葛隆大队的党群、干群和干部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象这样的同志，在农村中很多。她们的为人是那样纯朴，那样亲切热情，思想境界是那样高，那样美，同她们相比，我就觉得自己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气，实在虚假得很，不改不行了。

在火热的农村生活中，当我真正下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我才亲切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一教导的无比正确。在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有着成千上万的江水英式的英雄人物。可惜，过去由于文艺黑线的专政，使我们不能去接近他们，学习他们，表现他们。原先我演的江水英，贫下中农批评说象个知识分子。这就是因为自己长期脱离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对自己要表演的对象不熟不懂，结果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意识中的东西带到舞台上去了。领导上要我表演出江水英的朴素、亲切、大方。这六个字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崇高的精神品质的表现，可我总觉得演不出来。例如江水英对李志田做思想工作要亲切、细致、耐心，可我从来也没当过干部，怎么个表演法，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对着李志田老是微笑，也不等于亲切啊！经过几次下乡，使我心目中有了活生生的形象，原先空虚的头脑才开始充实起来。这时才体会到演江水英这样的英雄人物，表演上是越纯朴越好，不要什么花哨的东西。

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到自己肩负着为工农兵服务的责任的重大意义。觉得这么好的贫下中农，这么好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怎么能不去表现他们呢？



我们试验演出《龙江颂》，请贫下中农提意见，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和过去演《三不愿意》的情景恰好是个鲜明的对照。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使我感到应该赶快把江水英的光辉形象在京剧舞台上树立起来，演不好江水英，实在对不起贫下中农。

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带动艺术革命。过去演才子佳人，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演江水英如果也“从自我出发”，从我原先熟悉的一套程式出发，必然要歪曲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从英雄人物出发，就要否定“自我”。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原先驾轻就熟的一套东西不适应了，即使能用的也要经过改造。是守旧还是革新？这不单是艺术创造的问题，首先还是思想革命的问题。我过去学的是青衣。青衣的身段和唱念追求典雅妩媚，而江水英的身段和唱念必须刚健、挺拔、开阔；青衣唱和念的发声只用假嗓，而江水英的唱必须真假嗓相结合，念必须用真嗓，要富有时代气息，符合这一英雄人物的性格特点。这一连串的矛盾不通过深入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是解决不了的。就以真假嗓结合的问题来说，看起来只是声腔上的变革，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开初我总怕练了真嗓会把假嗓练坏，丢掉了这个唱旦角的“本钱”，所以真嗓总是出不来。这里就有一个为工农兵还是为自己的问题。如果是为革命、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练嗓子，就会丢开一切思想包袱，努力去克服自己原有的弱点，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艺术表演上来说，声腔只是一种手段，关键还在于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和把握了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做到以情带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真假嗓结合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当然，技巧的锻炼是重要的，但技巧总是为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的。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在世界观改造上下功夫，努力缩小自己和英雄人物之间的差距，使自己在演出时内心充满激情，这才是最根本的。这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几年来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文艺黑线曾经一步步把我引进修正主义的死胡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挽救过来，引导我走上了为工农兵服务、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光明大道，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江水英是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扮演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也是我的新的艺术生命的开始。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就我来说，这种变化和改造还只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第一步就经历了许多斗争。以后还会有新的斗争。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辈子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奋斗终身！



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

辽宁清原县丁家街大队 孙卫东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被贫下中农推选为大队的赤脚医生。三年多来，经过党组织的耐心教育和贫下中农的热情帮助，我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回顾走过的路程，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里；只有把革命热情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掌握防病治病的本领，才能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

刚当赤脚医生时，我热情很高。白天跟社员一块劳动，休息时给社员针灸；晚上，从东街跑到西街，送药问病到家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没有歇脚的时候。时间一长，觉睡少了，饭量减了，人也瘦了。心里便犯了核计：这样下去，不是把身体累垮了吗？村子这么大，赤脚医生又少，这么干，哪能受得了？干脆改行算了。

这个行到底该不该改？贫下中农给了我正确回答。一次，我进行疾病普查，老贫农徐大爷对我说：“旧社会我给地主扛活，得了心口疼病，你给我治好，我还要为革命多使把劲呢！”徐大爷的话，使我联想起他带病坚持劳动的情景：为生产队放牛时，他爬山岭，跨溪涧，从不说一声苦；放羊时，早出晚归，精心管理，从没说过一个累字；他长年坚持割草垫圈，清理卫生，不肯消闲。对照徐大爷的言行，想想自己，我脸发热，心内疚。老贫农遇事想的是革命，不怕苦。我呢，一事当前，想的是自己。对比之下，我找到了差距。不是赤脚医生干不得，而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要不得，差就差在我缺乏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

党组织对我非常关心，经常帮助我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我的父亲担任党支部书记，经常对我进行阶级教育，给我讲述旧社会“瘟疫洗村屯，尸骨遍山坡”的悲惨情景。在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下，我的奶奶得了重病，就是因为没钱治，眼瞅着断了气。刚懂事的小姑娘有病，连碗热汤都没有，端着空饭碗可怜地死去。全家十三口人，就这样先后死了十一口。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从政治上、经济



上翻了身。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使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社员群众的健康得不到保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贫下中农需要我担任赤脚医生，我不好好干，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呢？我明白了什么是旧社会的苦，什么是新社会的甜，更加痛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自觉地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把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想尽办法解除贫下中农的病痛，作为执行毛主席的卫生路线的实际行动。每当多发病季节，为了做到预防为主，我主动出诊，送药上门；有时遇到病重患者，我守着病人不回家。贫农盛大爷得了重病，我就给他打针、熬药、烧水做饭。当我把熬好的药端到盛大爷身边时，他激动地说：“卫东，要是在旧社会，我哪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盛大爷的几句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越来越感到赤脚医生责任的重大。

贫下中农每天都在地里干活，要向他们学习，不参加劳动是不行的。当赤脚医生以来，我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二百天以上（包括采药、种药、制药）。劳动和工作是否矛盾？不，恰好相反，通过劳动，还能够进一步掌握产生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规律。去年春天插秧时，有不少社员下了水腿就起疙瘩，轻的“刺挠”钻心，重的发炎化脓，对生产影响很大。看了这情景，我就主动向老农请教发病原因，并翻阅了不少资料，进行研究。最后用洋铁叶、白鲜皮等中草药，制成了流浸膏，送到地头预防和治疗“稻田皮炎”，效果很好。实践证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能炼红思想，而且能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面向生产。

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必须学习医疗技术。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一次，一个女社员由于不完全流产引起了大流血，只有立刻刮宫才能摆脱危险，但我不会做刮宫手术。后来经县医院抢救，她才脱离了危险。事后，我心里很不平静，深深感到，要当好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光凭热情是不行的。毛主席教导说：“**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担心学技术会犯“技术第一”的错误，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赤脚医生学技术，为的是解除贫下中农的疾病痛苦，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卫生路线，这跟刘少奇一伙鼓吹的那种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专为个人名利而学习技术的谬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为革命学



不学医疗技术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而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

我只念过七年书，在公社培训班学医只有两个月。学习医疗技术从哪儿下手呢？贫农社员王大娘闹痢疾，几次诊治都不见效。后来打听到一个民间验方，把王大娘的病治好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流传在民间的土方、验方，是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积累的经验，不仅治病经济，而且简便易学，是防病治病的有效途径。于是，我经常带着各种病例，虚心向老贫农请教，有时为了寻找一个药方要跑几十里。两年多来，搜集整理了一百多种民间土方、验方，丰富了我的医疗知识，在防病治病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我还注意向一切有专长的人学习。同时，在医疗实践中学习医学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医疗技术。我坚持从医药学的基础知识学起，并注意把治疗中的难题，作为学习的课题。一个贫农社员小腹发胀，排不出尿。我一面守护在病人身边，细心观察病情，一面和其他赤脚医生一起翻阅有关医疗书籍，经过分析研究，确诊是由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潴留。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很快把病治好了。我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尝到了甜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医疗技术也主要靠在实践中提高。只要结合实践学习，一定能使自己由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

赤脚医生要做好工作，应该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我们除了带领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外，还利用业余时间种了八亩药田，品种达二十七种。几年来，合作医疗站用土法自制了膏、丸、散、酊、针剂等各种成药达百余种。在使用这些新药之前，除了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外，我力争在自己身上注射第一针，亲尝第一口。一次，我们根据外地验方，试制出“复方独活”针剂，需要验证药效。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贫下中农的健康，应该有苦我先吃，有险我来担。我在自己身上试了第一针。针刚拔出，我就觉得浑身发烧，头发昏，药效反应强烈。经过分析，发现浓度过大，又重新配比。经过不断总结，反复研究，“复方独活”针剂终于试制成功了。

几年来，我为群众防病治病只做了一点点工作。在群众的信任面前，我常常想：我们队村子有边，人口有数，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没有尽头。毛主席教导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赞扬声越多，越注意找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学习和提高医疗技术，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是怎样巩固合作医疗的？

陕西延安县南泥湾公社马坊大队医疗站

我们马坊大队是一个山区，共有三个生产队，六十八户，二百九十一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一九六九年办起了合作医疗站。三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合作医疗逐步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前进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起初我们靠磺胺、抗菌素一类药物治疗，结果不到半年时间就把社员筹来的六百九十元资金花光了。这时有人趁机放冷风，说什么“合作医疗不顶事，不害病的吃大亏”。一些社员群众也批评说：“象现在这样的合作医疗，咱说啥也养不起。”在合作医疗有垮台危险的关键时刻，党支部指出：办合作医疗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大问题，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党支部狠抓了思想教育，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坚定了办好合作医疗站的信心。

同时，单靠磺胺、抗菌素一类药物治疗的教训，也使我们懂得了，要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不自力更生大搞中草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不行的。

搞中草药我们是“门外汉”，医疗知识也很缺乏，怎么办？同志们重温了毛主席当年视察南泥湾时关于克服困难的教导，一致表示：只要我们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我们拜老药农为师，深入群众搜集土、单、验方，虚心



向医疗队和本地医务人员学习，跟他们在防病治病的实践中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当地二百四十八种中草药的性味、功能、生长环境和采集时间。采药季节我们背上干粮，爬山涉水，深入产地，边认边采。几年来，我们两个赤脚医生共采中草药四千多斤，并充分发动群众采集中草药三千多斤。有的社员在突击采药活动中，主动为大家担任向导。八、九岁的小学生也积极上山采药。一天，几十个小学生一上午就采回八十多斤黄精。我们还自种了一些红花、大黄等常用草药；自制了烫伤散、止血粉、下奶灵、止咳剂、克山丸等常用药。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为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几年来，我们坚持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个社员患高血压心脏病、肺结核、胃病等多种病症，从一九六一年就卧床不起，多方求医，花去千余元，病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她爱人到医疗站说：“人家说何改珍是等日子的人了，可我还不死心，咱医疗站给好好治一下吧！”我们怀着无产阶级感情，经过较长时间的细心治疗，使何改珍病情显著好转了。现在她已能从事缝衣、做饭、喂猪等家务劳动，还能走二十多里路。我们还先后治疗过产妇产后无奶、子宫功能性出血、严重气管炎等，都收到了较好的疗效。一九七一年我们大队外出看病的只有两例，一是胃癌，一是脑血管栓塞，其余均由我们医疗站治疗，保障了劳动大军的身体健康。

办好合作医疗必须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由于受“重治轻防”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我们大队曾经吃过只管治不管防的苦头，卫生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威胁着社员群众的身体健康。合作医疗站建立以后，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伟大号召，宣传“预防为主”的重要意义，批判“重治轻防”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结合积肥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建立管水、



管粪、饮水定期消毒和每月定期进行卫生大扫除等制度。为了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我们按照气候、节令的变化及疫病发生蔓延的特点，适时地利用中草药煎成预防药，给全体社员服用。现在我们大队的社员逐渐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新风尚，全大队的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发病率显著下降。今年春上，全大队没有一个小娃发肺炎，没有一个劳动力因病误工。

培训卫生员的工作很重要。我们为各生产队培训卫生员二十名。经过一段训练，他们现在都能掌握三十多个针灸穴位，使用六十多种中草药，学会了肌肉注射、皮肤试验、战伤急救等医疗技术，头痛脑热等小伤小病，一般都能处理。有这么多卫生员和赤脚医生相配合，防病治病的工作就做得更细致、更及时了。

要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必须克勤克俭，发扬“南泥湾精神”。群众运动开展以后，采下一大堆中草药材，没有个好放处。买个药柜吧，就要增加医疗站的开支；不买吧，同志们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就会被糟蹋掉。究竟如何办？正在发愁时，党支部组织当年的老八路，给我们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边区大生产的历史。老八路的回忆使我们增添了力量。大家说：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大家一齐动手，用几块木板搭起了架子，用纸糊了许多大小不等的袋子，把药装起来放在架子上。同志们把这简陋的药架，称作“传统架”。抓药需要戥子，只要花三元六角钱就可以买来。但我们为了节约资金，就自己动手做，用罐头盒盖和一根筷子做了一个土戥子，用起来挺顺手。

几年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还远不适应党和贫下中农对我们的要求。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合作医疗工作做得更好。



坚持农民业余教育二十年

中国共产党蕲春县孙冲公社委员会

我们公社位于湖北和安徽的边界上，是个人烟星散的山区。解放那年，孙冲这个地方只有七十二个人识字，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当时一个恶霸地主到处挖苦说，“孙冲是黑冲”。

但是，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一九五一年冬，土地改革刚结束，翻身贫农就办起了一所冬学，下决心为革命努力学文化。很快，在党的领导下，成批的冬学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二十年来，农民业余教育始终坚持下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全公社共有常年夜校七十七所，学员四千三百五十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半数左右。入夜，座座山村灯光亮，队队夜校读书勤，呈现出一派认真学习的生动景象。

坚持农民业余教育的结果，全公社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前一字不识的文盲，现在达到高小文化程度的，有二百九十人以上；从前识字不多，现在达到中学文化程度的，有一百二十人左右。

革命群众通过业余教育，学了文化，推动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贫下中农畅谈二十年的变化，心情激动，编歌谣说：感谢党的好领导，组织我们上夜校，如今大家学文化，‘黑冲’变成亮冲了！

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我们公社的业余教育，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学习文化，一小撮阶级敌人却进行捣乱，胡说什么“黑脚杆子命里注定捏锄头把，做梦也拿不起笔杆子”。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多次揭发斗争了破坏业余教育的阶级敌人，批判了他们散布的



反动谬论。同时，广泛开展诉苦运动，通过诉说在旧社会因没有文化更受地主欺压的痛苦经历，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刻苦学习文化的自觉性。他们说：“记住过去的苦，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一定能学好文化。”后来，我们公社的广大贫下中农又顶住了“扫盲不搞，夜校不上”、停止学习的歪风，坚持把业余教育办下去。

阶级敌人眼见明里搞垮夜校的希望破灭了，便利用混进夜校当“教师”的坏家伙，散布地主资产阶级的黑货，妄图改变夜校的性质，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贫下中农及时揭露了阶级敌人的新花招，并选派表现好的回乡知识青年担任夜校教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夜校阵地，使夜校越办越好。

实行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相结合

我们公社在业余教育中，注意正确处理学文化同学政治、学技术的关系。有段时间，有些人认为，庄稼人上夜校，能识几个字、记个账、写个信就够了，不注意学习政治。又有一阵，有的夜校又只搞读报、开会等活动，取消了学文化和学技术。针对这些情况，我们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等教导，批判了各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坚持实行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相结合，做到：学政治，注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学文化，注重扫除文盲；学技术，注重实现科学种田。

第一、把学政治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学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夜校除重点组织学员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外，还围绕中心任务，选学毛主席语录。

结合形势，学习党在每个时期的重要方针政策。例如：土改时，学习党的阶级路线；农业合作化时，学习农业合作化的政策；人民公社化时，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学习“二十三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十六条”；当前学习党的路线斗争史；等等。对于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反复讨论、抄写、熟读，领会精神，贯彻执行。

深入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封、资、修的反动思想，及时组织批判。

由于夜校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党的方针政策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



学员受到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促进了新人新事不断涌现。

第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业余文化学习，使学文化经常化。

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夜校一所，逢三、六、九为学习日，每月学习九个晚上。学员登记名册，经常检查出席缺席情况。

根据山区居住分散的特点，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联户学习小组，指定文化程度高的学员为辅导员。

有的社员孩子多，家务重，夫妻同时上学有困难，就适当安排家务，轮流上夜校学习。

对文盲和半文盲，以辅导为主；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注意培养自学能力，由辅导员组织阅读、讨论、抄写、写心得，并安排他们搞些田头读报等活动。第一大队第十生产队还办起了业余初中班，增加了算术和工农业基础知识课的学习。

将社员经常见到的用具、门窗、树木、石头等都写上相应的生字，便于他们见物识字随时学习。有的学员把大地当纸，树枝作笔，在田头互教互学。

在小学教师和夜校教师的辅导下，组织小学生教家长或邻居认字，实行包教包学。

由于采取了这些学习形式，加快了扫盲速度。

第三、结合科学种田和生产环节，开展学技术活动。

遵照毛主席关于“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的教导，我们在夜校设立了技术课，根据科学种田的需要，按照生产季节，采取边学习边试验的方法进行教学。去年，公社第一次推广夏秧技术，我们首先组织社员在夜校学习有关夏秧的知识，并编写了《夏秧三字经》，作为夜校教材。学完后又组织学员亲自试验，培育夏秧，使夏秧技术在全公社都得到推广。许多学员在夜校学习有关技术后，带头在生产队种试验田，搞科学实验。第六大队第八生产队的一个学员，去年种晚稻试验田一亩九分，创造了山区平均一季亩产超过千斤的纪录。

认真解决课本和教员问题

农民业余文化学习，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自编不同程度的课本。我们公社从农业合作化时期开始，就组织贫下中农、学校教员、夜校学员，根据形势，结合中心，编写适应不同程度学员的学习课本。先后编写了《记工识字课本》、《文化技术课本》、《农业规划课本》、《速成文化课本》、《农村五·七政治夜



校课本》等。还紧密结合政治运动，编选了许多活页教材。这些课本就地取材，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易学易懂易记，很受学员欢迎。例如，结合本地生产实际编写的《节令歌》，学员反映说：“这样的课文，一学就懂得，一念就记得，既学了文化，又懂了技术。”

毛主席教导我们：“**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我们按照“政治上可靠、有一定文化水平、群众拥护、自己愿干”的条件，采取生产队提名，经大队党支部聘请的办法，选拔夜校教员。现在全公社有夜校教员八十人，其中一部分是回乡知识青年，其余的都是扫盲班毕业的夜校学员。对于这一批业余教师，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定期集训，帮助他们边教边学，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还树立典型，表扬先进，使大多数业余教师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努力为农民业余教育贡献力量。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公社在坚持业余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因此自满，我们决心继续前进，夺取新的胜利。

* 附：课文两篇 *

老 贫 农 说 家 史

老贫农，明海洋，一件破袄捧手上，
他给社员说家史，句句都是血泪账。

同志们，莫忘本，阶级斗争记心上。
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

节 令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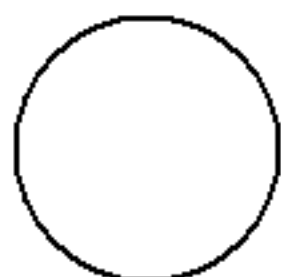
每月有两节，一节十五天。
立春天气暖，雨水农具添，
惊蛰下瓦秧，春分忙犁田，
清明插早稻，谷雨前种棉，
立夏收豆麦，小满勤薅田，
芒种播种毕，夏至到热天，
小暑割早稻，大暑复晚完，
立秋抓秋收，处暑摘新棉，

白露种蔬菜，秋分快翻田，
寒露忙秋播，霜降甘蔗甜，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冬季活路多，安排要周全：
积肥修水利，造林又整田，
培育除杂草，人人忙不闲，
总结订规划，迎接更大丰收年。



学 习 心 得

在实践斗争中增长才干



—— 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点体会

西北国棉一厂 吴桂贤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的同时，结合学习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进一步弄懂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些道理，看清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祸害，感到比过去心明了，眼亮了。我深深认识到，现在职务变了，责任大了，更要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才能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离现在将近一百年以前的杜林，离开人的社会实践，胡说了一大堆什么“原则”啊，“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啊，“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啊，等等，妄想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欺骗人们，跟着他去反对马克思主义。杜林骗人说，他的哲学研究对象有三部分，一是原则，二是自然界，三是人类社会，按顺序排列，主观世界的原则“走在前面”，客观世界的对象“跟在后面”。在他看来，按照头脑里制造的“原则”就可以引出“社会主义”来。很明显，杜林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用大量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杜林的这种先验论，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



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和杜林唱的是一个调子，宣扬什么办事情要“从主观到客观”，他的恶毒用心，就是妄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否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纺织工人都知道，棉花是纺织厂的食粮，没有棉花，就纺不出纱，织不出布。如果有了棉花，没有人掌握机器进行生产劳动，仍然纺不出纱，织不出布。要学会纺纱织布，有个实践过程。我是一九五一年进厂的。那时老师傅技术最好的能看二百五十来个锭子，我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好了。我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摸索和学习，二、三年后就能看六百锭子，后来又提高到八百锭子、一千二百锭子，现在两千锭子也能拿下来，而且车速比原来加快了一倍多。我们看锭的水平自低到高，本事由小到大，都是在实践中学下的，经下的，练下的。有人讲我们解放后进厂的工人天生就比解放前的工人聪明，这话不对。哪有天生的聪明！旧社会的工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能干，更不是象地主、资本家骂我们是“穷命鬼”、“天生的笨蛋”那样。在旧社会，我们工人被资本家压得抬不起头，吃不饱肚子，聪明、才干哪里能充分发挥出来呢。今天我们工人能够有些文化，掌握一些技术，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步一步得来的。“眼过千遍，不如手干一遍”，象这类普普通通的道理，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实际的例子，这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们平常讲的原则，包括办法、理论等等，都是从实践中经过概括、总结而得来的。比方说，我们纺纱、织布就有一套工作法，这也可以叫做纺好纱、织好布的一个原则，因为它解决了我们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适合于当前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总结是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一个飞跃，它的基础是工人的实践，没有实践，任何原则也跑不到生产斗争的前面去。

对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也是这样，来自阶级斗争的实践。离开现实的阶级斗



争，就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就不可能认识每过几年总有一次大的斗争出现，就不可能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总是要与党与人民为敌，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对这条规律，我们也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的。过去我思想上觉得，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厂里不大可能有激烈的阶级斗争了，不会有坏人明目张胆地出来捣乱了。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班里就揭露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个家伙有个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这家伙是文化大革命前来到工厂的，分到我们的“赵梦桃小组”。刚来时，他工作干得还可以。后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逐步暴露，大家对他多次帮助，没啥效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串通一起，破坏团结，破坏生产，恶毒攻击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群众对他反复的斗争，揭发出大量罪行，我们才看透了这家伙的反动本质。联系到我们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也是这个情况。刘少奇一类骗子是一步一步暴露的，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中，也是一步一步认识他们的。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领会到毛主席的教导：“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因此，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亲身投入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践中去，才能不断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多年来，我一直是个普通的工人，现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又不脱产，又要工作，实践的范围大了，接触到的好多事情，自己是第一次听到的、看到的。和老干部在一起工作，我看到他们说话比较说在点子上，工作比较抓到要害上，心里很着急，总想快一些掌握一套办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毛主席曾经指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不深入实际，不刻苦学习，办法，才干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脑子里蹦出来。明白这个道理，我就经常注意在新的情况下多深入各方面的实际，不懂的东西多学多问。前年，我第一次走出我长期所在的



“赵梦桃小组”，来到我们细纱车间丙班。这个班是厂里的“老大难”，革命和生产长期上不去。我到这个班以后，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促膝谈心，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弄清了丙班后进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党支部忽视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没有很好地抓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于是，我和党支部成员一起，带领群众从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入手，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联系实际，肃清流毒，这个班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段工作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从这件事中我体会到，职务给人以责任，实践给人以才干。人的认识绝不象杜林和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是什么头脑里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职务变了，更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动脑子，善于思索，才能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看到问题的全面，抓住问题的本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解决。

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这就是说，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认识。在丙班工作的半年时间，我和这里的一百六十多名工人同志一起战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打了一个翻身仗。这时有的同志说：“要不是桂贤亲自来抓，咱们的落后帽子还甩不掉呢。”我把这话看作是群众对我的鼓励。实际上是群众的力量大，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的。如果摆错了个人和群众的位置，就要犯唯心主义的错误。我初到丙班和同志们谈心时，有个同志对我讲：“你看，我们丙班的人都不长‘胡子’。”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说：“女同志就没有胡子嘛。”她说：“我们整天有人‘刮’，哪能长‘胡子’。”原来他们的革命、生产上不去，老是挨批评，挫伤了积极性。这使我深思一个问题：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群众的一员，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发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向自己提出了要求，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我到丙班后，亲眼看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广大工人同志，为了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早接班，晚下班，学习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勇敢上阵，许多同志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在一次全



班大会上，我和党支部的同志商量，表扬了五十多个同志，并表示向他们学习。散会后，一些同志围住我说：“我们哪有这么多优点啊！”我说：“这是你们干出来的，我们亲眼看到的。”这一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股劲地争上游。我在丙班工作，能够在里边出了点主意，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群众的意见和智慧的结果。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绝不是个人孤军作战。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不管你职务多么高，也不可能拿出什么好办法。从此以后，我注意经常深入到群众实践中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从群众中吸取营养；有了成绩，记在党和群众的帐上，有了缺点和错误，就请群众批评帮助；老干部实践经验丰富，就向老干部学习；自己的徒弟接受新东西快，就反过来当他们的徒弟。我们只有从思想上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永远和群众打成一片，诚心实意地当好群众的小学生，才能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杜林和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把自己装扮成不依赖群众实践的天生的“能人”，超群的“超天才”，救世的“英雄”，好象世界上没有他们这帮家伙，地球就不转了，这真是螳螂挡车可笑不自量。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社会实践，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任何反动派妄想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只能被压得粉身碎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我们在实践中要不断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绝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把事情看绝了。有一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我和细纱机打了二十来年交道，总感到对纺纱接头是有把握的。可是，去年我到上海兄弟厂去学习，有个厂纺的是棉胶混纺品种，当时我想，棉胶混纺和我厂生产的纯棉纱的接头方法都一样嘛，所以就没大留心，拔起纱管就接头，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个头接了四次才接上。一问，才知道这种纱的纤维短，但强度比棉纱大，掐头比棉纱难掐，接头也比棉纱难接。今年初，我厂开始生产“的确良”新品种，接头又比棉胶混纺的纱还要难一些，不仅强度大，纤维也长，又细又滑，初接纱头时，连纱头都掐不断，实践一段时间才适应了。同样都是纺纱



接头，但不同的品种各有特性，当我们对它的特性和规律还没掌握时，就是不熟练，接不上纱头。这就告诉我们，要干好任何一件事情，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使自己的认识跟上去；盲目自满，不用气力，就会离开唯物论，滑到唯心论方面去。

如果按照杜林和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终极的真理”、认识可以“到顶”等谬论，那还要什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什么参加革命实践、不断发展认识呢？杜林和刘少奇一类骗子根本不懂得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认识也不可能“到顶”。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深刻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用恩格斯当年批判杜林的这段话来照照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认识可以“到顶”的谬论，不是非常恰当吗？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根本不信他们那一套。我自己不懂的事情很多，今后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永远不停步；同时，要做到自知之明，经常解剖自己，努力使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相一致，自觉地抵制唯心论的先验论。

从恩格斯批判杜林，联想到我们今天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使自己认识到，一个个骗子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当前，全党进行的批修整风运动是头等大事。我们要在批修整风中，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认真弄清是非界限。今后我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地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改造思想，增长才干，努力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要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学习《法兰西内战》的一点体会

东北机器制造厂 尉凤英

《法兰西内战》是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一部光辉著作。我在批修整风中，结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读了这本书，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伟大学说的理解，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深深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的干部做普通劳动者，反对特权思想，克服官僚主义，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大问题。我是一个普通工人，现在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更要注意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和广大群众一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经过充分地发扬民主，选举由普通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组成新的政权机构。普通劳动者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直接管理国家大事，这是巴黎公社一个伟大创举，它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任何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人，不论是来自工人阶级，或是来自其他阶层，都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以保证把革命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毛主席的指示，对我们反修防修，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干部，只有做普通劳动者，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扫除官僚



主义灰尘，才能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粉碎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伟大导师列宁曾多次指出，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腐蚀，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并采取了措施，防止国家工作人员变质。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之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搞起一个与广大劳动群众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拣煤核、挖野菜的苦孩子；在新社会，我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并且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我的地位变了，普通劳动者身分不能变。党的“九大”以后，我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的教导，回厂参加劳动。工人们对我又是欢迎又是照顾，劳动一会儿就要我休息；有时生产忙，临时加班也不叫我知道。我想，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这个普通工人就会变得不普通了。我本来是一个普通工人，虽然担任了领导职务，也还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参加劳动是我的本分。在劳动中，不能摆架子，做样子，要和其他工人一样，遵守劳动纪律，参加技术革新，完成生产任务。我不自视特殊，群众也就不把我当外人看待。我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从群众那里学到许多好思想、好经验。在与群众共同劳动和学习中，我加深了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不同的就是我们担任了领导职务。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党和人民群众把权力交给我们，给了我们必要的工作条件，我们就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我担任了领导职务以后，领导和群众在工作上、生活上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十分周到。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我想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和群众的照顾，是为了使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应该以普通劳动者的标准要求自已，做到地位变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不变。所以，我经常注意到：办公事，是群众的代表，要千方百计地去办好；办私事，是群众的一员，不能特殊化，不能公私不分，更不能假公济私，利用职权为个人谋私利。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受苦。”吃饭，坐车，住房，看来都是生活小事，但不加警惕，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生活上特殊化，就会导致政治思想上的蜕化。我们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决不能忘乎所以。

要坚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就要自觉地把自已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巴黎公社的各级领导成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些勤务员经常是**



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和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都是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能一当上干部就自以为了不得，甚至爱吹不爱批，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而要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自觉地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不断地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以适应党和革命的需要。我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群众的监督是对干部在政治上的爱护和关怀，是使我们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了巴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主席也谆谆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充分相信群众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力，认识到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才能自觉置身于群众之中，做群众的一员，为自己是一名普通劳动者而感到自豪。我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工作范围比以前大了，听到的赞扬声也比以前更多了。当我和群众一起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时，一些同志常常提到我的名字和作用。我觉得，这是群众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工作的成绩是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没有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我又能做些什么？领导的责任是组织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秤砣虽能秤千斤，秤砣没有千斤重。”领导的责任虽然重要，但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却是可以变化的，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巨大威力，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则是任何个人力量代替不了的。刘少奇一类骗子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超天才”、了不起的“英雄”，他们虽然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际上他们是大大野心家，妄想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能不能坚持做普通劳动者，实质上是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还是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问题。要自觉地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唯心史观，牢固树立唯物史观。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我就更加注意谦虚谨慎，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好。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亲自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思想财富。今天，我们在批修整风中学习这些经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决心认真看书学习，努力弄通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